

二民主義与民主主義

著 廬外侯
刊店書風長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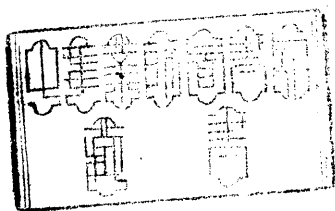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477B

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

侯外廬 著



上海長風書店發行

1536277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

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侯 外 廬

發行人 徐 啓 堂

發行所長 風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印刷者 國 華 印 刷 廠

廣州中華中路316號之一

經售處 光 明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目錄

自序

中山先生遺教的核心精神——民主主義·····	(一)
民主主義的科學研究·····	(二〇)
民主主義的偉大理想·····	(四三)
關於民主主義研究的方法問題·····	(六四)
民權主義的理論與建國·····	(七〇)
抗戰建國與中國憲政之路·····	(八二)
論解放戰與民族主義·····	(九四)
論中山先生『打不平』文化的光大·····	(一〇三)
中山先生論蘇聯·····	(一二四)

序 言

著者在民國廿七年至廿九年之間，因了當時關於民生主義的討論，文壇上表現出異常混亂，而令人頗不能忍耐之故，寫作了三民主義理論研究的許多文字，發表於重慶的各種期刊上。在這些文字中，沒有時間對於任何人作過正面批評，而祇是積極說明我自己的心得，因此亦就沒有引起關於理論上的探討與辯難，除了有一短篇答覆錢俊瑞先生的質疑而外。

著者寫作三民主義的文字，可以說極費了思索與訪問的工夫。中山先生雖然說過他的主義有待後起者匡補闕疑的，但偉大的一代導師所結晶而成的學說，則不能隨便解釋，唯意所向，而無賴於科學的依據，歷史的根源，以及創說者的革命精神，實踐奮鬥，僅空洞其詞就可去探求的。故我人必須涵泳於中國近代史的底裏，深深地去挖掘這一與近代史有息息相關的代表思想，才能够有所成就。著者，不敢自云所研究者，必與三民主義膾合無間，但頗信對於三民主義之個人心得研究，亦可供學者的參考，我亦因此項研究的發表，認識了國民黨人士，如譚平山先生，張志讓先生，祝世康先生，張九如先生，于振瀛先生，他們都對於我是給了期望的鼓勵的。而我的老友黃松齡教授，更過分讚譽，說我的這項研究是抗戰以來有發現的學術論文。時加函商討論，使我得到不少的益處。

然而在我，終不敢在整個體系上寫作三民主義，近兩年來埋頭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偶亦計劃把中山先生的學術理論做一個概括的說明，但畢竟空白了，原因甚多，而自己的研究火候未純，亦是一個理由。至於將來寫作中國近三十年思想史有可能時，當要完成此種心願，而雛形則可以說已

經在這個集子的論文中有其端倪。

著者，研究三民主義是和革命民主主義相提并論的，惟在理論上了解三民主義的核心——民主主義，並不是一句空話所能盡事的，其間包含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理論以及中國近代史的合理發展。中山先生規定他的主義是「打不平」三字，在國際平等上「打不平」者是民族主義，在國內政治上「打不平」者是民權主義，在經濟問題上「打不平」者是民生主義，甚至他說中國的文化前途亦是「打不平」的文化，所以在政治學的意義上而言，謂之革命民主主義，在文化思想上而言，便謂之「革命的人文主義」了。凡這些研究，我在這本集子中都有學術說明，這在發表此項論文的前五六年或者尚不爲人所十分注意，而到如今，世界政治家著作家，都提倡民主主義的三大自由，其中有所謂「不虞貧乏的自由」，亦即民生主義在實質上爲民主主義的補充了。所以，中山先生所謂「現世是民主潮流」，「我的主義是打不平」，根據「民主是平等的意思」而言，問題是在時代的歷史自己照映裏，頗爲自明的了。

這亦再用不着如前五六年，有些人空洞地辯論三民主義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那些空洞問題的提出，實在是對於民主主義缺乏最低限度的了解。著者，當時就「民主主義的高漲」而貫串三民主義，就是在積極的理論說明上批判那些辯論者，現在這問題該是不足奇怪的了嗎？

這本集子的書名「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是迎合世人所喜談的時髦題目而標題的，而是就理論研究的內容上所許可而定名的，前五六年著者的研究，和五六年後的今日，大體上並沒有改變的。因了許多友人要我過去的這些論文參考，頗難一一報命，所以把它集成這一本書出版，這裏希望讀者惠予批評！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此書由 孫君 捐贈

中山先生遺教的核心精神——民主主義

一 革命民主主義之反改良妥協的核心

中山先生一生奮鬥的精神充分表現了一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誠如中山先生自己所說：「三十餘年來，文與諸同志實行革命主義，不惜與舉世爲敵，微特滿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撓吾懷抱，即舉世之訕笑咒詛，以大逆無道等等惡名相加，亦夷然不以爲意」（見北伐帥令）。由興中會、同盟會、辛亥革命，以迄十三年改組，不論任何階段的革命深入，中山先生都把握着廣大羣衆勢力，堅持着革命政綱，而進一步求深刻的領導，以與自由改良派的妥協路線作堅決的鬥爭，以貫徹「國民革命之目的，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見北伐宣言），以實現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的民主主義所謂「建立民國，期成政府，擇選民主，推置總統，簽意能尊重民意，宣達民意。惟公賢，廓清專制，鞏衛自由，惟公賢，光復禹域，克定河朔，舉漢滿蒙回藏羣倫，共處於平等之政……疾首蹙額，望民主若歲……忭舞自由，敦重民權……國民委託於公者，亦已重者。」

革命民主主義的精神，在於貫徹民主政綱的本質與內容，而與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取得形式民主爲已足的維新路線，正相背馳，所以中山先生有以下一段評論改良主義之精到語：

「不期國人之意識……辛亥之役，以爲在使清帝退位，則民國告成，謳歌太平，坐得共和幸福之

降臨，此外無復餘事，所有民國一切之設施，與舊制之更張，不特不以為必要，且以為多事。丙辰之役，以為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則民國依然無恙，其他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妨蕭規而曹隨，似袁世凱所為，除帝制外無不宜於民國者。……故辛亥之結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結果，袁世凱取消帝制而止。」（見先生自述革命史）

這種反改良主義的和反忘棄民主政綱的精神，即列翁先生在辛亥時代所希望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的「孫逸仙先生的政治綱領與土地綱領中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並且說：「孫逸仙綱領底字裏行間，充滿着戰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夠，他絲毫沒有不問政治或者甚至於絲毫輕視政治自由的態度，甚至於完全沒有認為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及立憲改革等同時並存。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羣衆鬥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信賴他們的正確與他們的力量。」

中山先生的革命歷史，可以說是一列信賴羣衆力量而為民主政綱奮鬥的光榮記載。當清代樸學大師努力於中國一部份良好知識的歷史代數學傳統時，正是中國農民開始種族革命而到太平天國倒滿光復的怒潮時期，中國知識階級的形式知識運動和中山先生所謂「寶藏民族」的下流社會運動脫節，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初期興中會便是繼承了二者而復統一了這個學術形式與社會運動的偉大歷史制作。所以知識階級的「公車上書」，祇能代表改良主義的知識自覺，而將意識覺醒與社會運動二者統一代表者就是中山先生的初期革命，當戊戌政變「舉人造反」而企圖脫離中國農民的宮庭維新時，正是中山先生蒙難脫險時期（一八九八年，先生已經「殊多心得」，已經有思想的新要素，產生「民權革命與

1503

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思想，這種客觀上不是民主與社會主義相混合，而是民主與社會主義相聯結之「澈底民權革命」，已經宣佈「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民主高漲的政綱。當辛亥革命以後，一部分自由主義附衷妥協而幻想維新的「實行」時，中山先生則適應中國革命深刻的發展，而以爲辛亥革命是「無意中得之」，打擊後退妥協的自由主義的「不知而行」，產生「知難行易的民主革命的文化理論，克服「實行與理想」的對立的錯誤觀念，堅持民主革命的政綱與方略。當中國大革命的前夜，中國改良主義者尙夢想好人政府時，中山先生發展了「重新研究」的三民主義演講，重新估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性質，真正實行駕乎歐美而上的「民主革命高漲」任務，在抗議作商團變亂後盾的帝國主義文件中，有光輝的文字：「帝國主義所欲破壞之國民黨政府，乃我國中唯一努力圖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禦反革命之中心，故××之礮欲對之而發射。從前有一時期，爲努力推翻滿洲，今將開始一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並且，把中國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的橋樑，不但在講演的主義中表現出連結的理論，而且用政綱具體化起來。

以下我們應當把中山先生革命民主派的奮鬥歷史，簡略敘述一個輪廓：

(甲)我們知道，中山先生一開始革命的歷史，就和那違背農民利益而與封建貴族妥協的自由派，分道揚鑠，與中會的「興中」號召，顯然是曾左李「中興」的對立，所以他說：「乙酉以後，……士大夫方醉心功利名祿，唯所謂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富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革命主義

立黨之始。……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合併於興中會，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因此，一開始就信賴「下流社會」民衆的中山先生被目爲「四大寇」之一，被清庭懸賞購首，中山樵與高野長雄的筆名皆在此時（中山先生之尊稱卽中山樵筆名之簡稱）。

然而正當這時，有所謂「名義上的一致，事實上的分散」（在事實上一切集團都是獨立的，彼此進行談判和協商。和獨立的列強一樣）之一個最壞的「政派」，那就是保皇立憲派。中山先生爲了革命的聯合，既聯合興中會、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組織同盟會，在日本曾經和康梁談判過，希望梁啓超等覺悟，最後則證明了保皇黨的陰謀欺騙。中山先生遂決然與改良派鬥爭，因爲保皇黨名義上雖與革命民主派虛與委飾，尤其梁啓超清議報時代脫離任「康門」而號任公時，謂其目標一致，僅有「曲折苦衷」，而事實上則報告清庭出賣民主派。這正是所謂「最壞的政派主義，沒有任何思想上政治上的明確性」，如康有爲的大同書與商業救國，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國愛種之過於其恩主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爲」（程蔚南語），猶之乎託洛茨基的「非政派主義」，而其「特許證祇許他在這一政派與另一政派之間完全自由的飛來飛去。」

中山先生與保皇會之鬥爭，在戊戌以後更爲顯著，康梁輩會假商業救國之名，迎合華僑心理，創造所謂香港振華實業公司，墨西哥華益銀行，紐約瓊彩樓餐館，上海廣益書局，廣西太平山金鑛公司等等，以繼承李鴻章的洋務衣鉢，而騙取華僑股金不下千數百萬。康有爲起兵勤王的僞衣帶詔，梁啓超的冒名國務總理大臣，都是保皇會的破壞革命的勾當。中山先生會用了耐心的說服工作，才將太平天國後裔致公堂爭取到倒滿的方面來，崇中山先生爲「洪棍」（卽元帥暗名），後以「大哥」（首領）

呼之。先生遂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內云：

「中國之見滅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俵，殘同胞而媚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爲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尊滿人而抑漢族，假公濟私騙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礦務也，商務也，學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奸，不肯附和，遂大觸彼黨之忌，今值本黨舉行聯絡之初，彼便百端誣謗，含血噴人，蓋恐……其所奉爲君父之滿賊，亦必覆滅，則彼漢奸滿奴之職，無主可供也。其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可勝誅哉！」

這一反對維新妥協改良底革命民主主義鬥爭精神，正是中山先生的至剛至大的傳統，所以，在這一點，不但民主派的政綱「驅逐異族，光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載於致公堂的綱領第二條，以揭破保皇派「仇視革命比滿清貴族爲尤甚」的陰謀，而且爲了「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創立民報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見中國革命史），到了一九〇五年以後，在保皇黨的宮庭維新的對面，已經掀起革命的高潮。歷史上清末的有名的各級民衆暴動，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正如先生所言：「前仆後繼，意氣彌厲。」列甯曾說：「在中國，近幾月來，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運動，特別表現得厲害。固然關於這個運動，還不能作什麼確定的結論……因爲關於運動的消息很少，關於中國各地變亂的消息倒很多……可是中國新精神及歐洲潮底嚴厲的發展，尤其在日俄戰爭以後，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中國舊式的變亂也必然會進爲有覺悟的民主運動。這一次，有些參加掠奪殖民地的人是很爲着急的，這一點，可從法人在安南的行爲可

以看出來：他們曾幫助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來壓迫革命家，他們同樣害怕喪失「自己的」那些與中國接壤的亞洲屬地。」（註：這大約指河口之役）

各地暴亂進爲有覺悟的民主運動，便是辛亥革命。

（乙）辛亥革命，按中山先生的評論：「一爲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二爲剷除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爲國人所公認。」

列甯對於辛亥革命，以俄國社會民主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決議形式，曾表示關切的同情：

「由於政府的和自主義「言論」等報紙，站在俄國資本家底利益上，利用中國的革命運動來鼓吹與俄國交界的邊疆脫離中國。臨時代表大會指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底世界意義，這一鬥爭將使亞洲得到解放和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大會慶祝中國共和國政府革命家們，牠表明俄國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人民表示深切的興奮和完全的同情，他們注意中國革命人民的勝利，並痛斥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幫助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行動！」

世界上前進的人士，都在担心帝國主義絞殺辛亥的歷史，列甯上面的話正是關心到這點，高爾基亦有同樣的關懷，他致書中山先生說：

「尊敬的孫逸仙先生：我們在精神上是兄弟是同志……我慶祝你的成功，一切公正的人們，都關心這工作，都對你這位中國的赫爾古利斯表示注意、高興與驚奇。……我們要求全力打擊我們的敵人的惡意，這些敵人準備熄滅日光，以求便於他們的黑暗貪婪事業。」

153

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過程中，所以是革命的民主主義，就因為代表了農民的民主革命。因為，「完全沒有懂得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相應的關係」及其區別，「不了解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革命的這種性質」，因此也就「不了解在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俄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的根源」；認不清「在這個革命中究竟那些階級才可以把革命進行到底，獲得完全勝利」，「認不清」像俄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只有在其已成爲農民革命時才能得着勝利」，便祇有妥協的路綫。我們知道，在先進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到墮落時期，後進國的資產階級原是在地主的擁抱下方發展起來，遂反映出資產階級的先天妥協性；反之農民卻與農奴制勢不兩立，遂形成農民代表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殊性，而實行澈底的民主主義。

所以辛亥革命不可能是一般的民主的革命，而是所謂，「這一個還能從事於歷史上進步事業的亞洲市民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的社會支柱，就是農民。和農民相並列的就是自由派資產階級，它的要人如袁世凱一流人物是最善於變節的。昨天他們害怕皇帝，卑躬屈膝，今天看見了革命勢力，感覺到革命民主派的勝利，就背叛皇帝，明天呢，他們又會和什麼立憲皇帝實行勾結而出賣民主派。」

因了中山先生的澈底民主主義，把亞洲的歷史寫在先進的地位。所謂「歐美先進文明國的總統都是些資產階級的代辦或木偶，而這種資產階級又是腐朽了的，從頭到腳遍身都沾着污泥和鮮血，早已拋棄了一切青春理想，已經完全淫亂了，已經完全賣身給百萬富翁、資產階級化的封建地主了。然而這裏亞洲共和國的總統（中山先生）却是革命的民主派，都是充滿着下面的這個階級（指農民）所具有的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概的，這個階級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是不怕將來而是信仰將來的，並爲將來

而拚命奮鬥的；這個階級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他的臭爛和妨礙生活的廢物，而不打算去維持自己的特權，來圖謀保持和恢復過去的東西。這是否說，唯物主義的西方已經腐敗了，而光明只是從神祕主義的東方放出呢？不，恰恰相反，這是說東方完全跑上西方的道路，從今以後，幾萬萬新起的民衆將參加鬥爭，以期達到西方所達到的理想。……在亞洲還有能夠代表真正奮鬥的和澈底的民
主派……。」

辛亥革命，雖然如中山先生所言，「僅得中華民國之名」，「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但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之政綱，則固革命民主主義。所以列甯崇贊：「這是否會成功和成功到什麼程度，這是另一問題。各國在自己的民主革命中實現了程度不等的政治上及土地上的民主主義，而且在極複雜的錯綜之下實現的。這要由國際局面和中國各種社會力量底對比來決定。滿清皇帝大概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侶統一起來，以謀復辟。好容易才由自由保皇派變爲自由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代表——袁世凱，將採用一種在帝制與革命之間隨風轉蓬的政策。然而孫逸仙先生所代表的民主派，認爲在政治改良及土地改良的事業上，盡量發展農民羣衆的自動性、堅決性及勇敢性，乃是謀中國「維新」的道路，這是正確的。」

在政治局面上，五國銀行團之助袁（二千五百萬鎊之大借款），在社會力量的對比上，自由派之附袁，都是辛亥民主的敵人，而放棄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綱，走向妥協苟且之路，使最低度的民主亦沒有實現，更是問題的中心。

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即當時所謂「余所力爭者地方自治是」，又云「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

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子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以下論革命之破壞與革命的建設）（見建國方略）又云「重實行而輕理想，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略巴斯德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虫之蝶蠶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澈底詳闢，使……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陳英士先生致黃克強先生書說：「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然而微諸過去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英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

中山先生所堅持的是革命政綱，以澈底掃除中古舊污，以實行三民主義，而改良自由派則羣忘記主義與政綱而妥協於立憲主義，所中由山先生後來批評這種妥協說：「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政（註，世界歷史上改良主義者皆然），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制新政（註，即自由派的反動性）。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行，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民治之名而去之也。」這是何等光輝精闢的偉論！

「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爲空文。……以縣爲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爲民治，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今先後顛倒，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見遺教中國革命史，全集四）

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專制餘毒；滌除淨盡；國民權利，完全確實。」然而此種革命民主主義，則被所謂「實行家」的急功近利的「混亂是非」，誤爲理想太高，不信輅巴斯德的科學，而委曲求全於政治上的豆腐公——袁世凱。

中山先生「地方自治」的革命方略，正是所謂「鼓吹輿論倡導文明」「革命建設」，「盡量發展農民的自動性、堅決性與勇敢性」；然而「實行家」則自足於「滿清推倒而止」，如當時汪逆精衛所言：「現在不必革命了，祇有修鐵路的工作了！」（據何香凝先生語）有這樣受袁氏賄賂而唱和議的總理叛徒汪精衛，無怪乎中山先生痛言曰：「假使予仍爲總統，而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而代替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補益，是亦以暴易暴而已，夫如是則予無爲總統之必要也。」（見建國方略）「惜予就總統職後，此種計劃爲同志所格而不行。」「惜予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爲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却天職，致使革命事業祇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悲乎！」「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則以爲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及乎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由墜也！」（同前）

「來往自由」的自由派，正是「多途出之」！辛亥革命由於「多途出之」的自由派不由革命民主之路，放棄革命政綱，而代替以宋教仁諸氏所改組之「黨員加多而黨綱與效率較前退化」的改良主義（見全集一，十三頁），所以中山先生說：「此所謂合九洲之鐵鑄成大錯！」（見遺教，革命史）然而歷史不容把革命民主主義淹沒，中山先生與自由派相對立的革命民主主義政綱，是謀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便是所謂「革命由民衆發之，由民衆成之」之宗旨——見十二年國民黨宣言。（註：「宋教仁圖以政治手腕制勝，力聯他黨爲合組大黨之計，同志多反對之。……且以政黨內閣相號召，終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爲國民黨，同盟會黨員，多有痛哭者！」見鄒魯黨史稿第三〇頁。「宣言黨綱，將革命主義與精神幾全喪失，而着眼復不出於參議院之內。」同上，第四三頁。）

所以中山先生在中華革命黨誓約上寫有：「附記 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而在其宣言中有「排斥官僚與淘汰偽革命黨」之語。

（丙）中山先生說：「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今乃……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怠也。」

因此，中山先生本其革命民主主義之初衷，當袁世凱出賣民主派的時候，中山先生告袁：「君今

已爲國家之罪人矣！則我日前反對滿清之舉，將起而反對君矣！」當某國領事要求南方政府參戰的時候，中山先生則嚴詞拒絕參與帝國主義的屠殺火併，一段革命氣概的佳話，永垂不朽（參看民族主義講演中與英領事的談話）。當民十三改組以後，商團事件發生，中山先生老當益壯，對外宣言：「從前有一時期，爲努力推動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帝國主義用反共不反國民黨之欺騙，破壞團結，動搖者如汪精衛之流表示屈服，而中山先生在會議席上發表了最堅決的演辭，有「帝國主義不反對國民黨。請諸君在，我願爲帝國主義之反對者！」之語。相應於革命之深刻而革命奮鬥亦擴大並緊張，正是革命民主主義之發展的本色。

在民十三時代，中山先生更明白指斥了改良妥協的錯誤，而求貫徹革命民主派的精神，他說：「我們從前革命均未收好結果，就是因爲是沒有貫徹革命，其原因大都是我們同志負擔責任沒有始終如一，所以不能貫徹主義。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就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以致革命……失敗。……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翻，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對外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決不能又蹈前此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取消，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之大錯！」（全集二，一五七頁）

中山先生不但有這樣的言論，而且關於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還有這樣的決心，他給蔣總裁的一函中說：「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

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精衛不能降心相從，且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澈底解決。……若至維持不住，……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爲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精衛之所宜也。」（全集四，五六頁）

在偉大的時代，中山先生「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全集三，一六八頁）實在是快刀斬亂麻的偉大領袖的歷史創作！他說：「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爲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倣效其辦法，也應倣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見對黨員訓話）

然又恐自由妥協的「實行家」又出而誤爲「理想太高」，所以在民生主義講演有這樣的話：「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祇知道有民族主義……以爲只要推倒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在當時以爲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便自然聯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所以他們對於民族主義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莫明其妙。……民國成立……大家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對於民族主義有許多都是模稜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毫無心得，……經過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兩個主義都是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族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

「中國越落後於歐洲與日本之後，便越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祇有革命民衆底英勇精神，才能「維新」中國，在政治方面創造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最快的資本主義的

進步」，而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

中山先生在民十三時代的徹底民主革命的一切主張與政策，正是說明了這一任務的具體裁製工作，在抗戰建國的今日，這一遺教的明鏡是我們的行動指南。當民十三時代，中山先生說：「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行政綱，為第一步之救濟方法。」現在，危迫更甚，抗戰建國綱領之實行，亦應是第一步方法。

二 三民主義，民主革命的高漲，民主主義的補充

上面我們是說中山先生的政綱的領導方面，而研究革命民主主義之核心精神，下面我們再由中山先生偉大的主義方面來說明這一核心理論。

研究三民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應問一貫的核心是什麼？

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叢書三，四〇頁）「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即民族革命主義。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絕不能少數人壓迫多數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全集三，五九頁）

「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謀民權的平等，而且在社會上要經濟的平等。」（叢書三，一九頁）

「更行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民生

主義是對貧富爭平等的……。」（全上，六八頁）

「民族主義就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就是從國際上列在平等地位。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民生主義就是弄到入人生計上經濟上平等。」（全上，三四頁）

這裏有一個注意點，即「平等」是三民主義的一貫主張。中山先生常說：「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就是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全集三，三四九頁），所以「打不平」一義可以與「平等」相互為證。此外，中山先生亦常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的主義」或「我的主義是革命主義。」

我們僅就字面上研究，祇能說三民主義是救國革命的打不平主義，但是問題却不能這樣了解。

根據社會科學的說明，「民主就是平等的意思」，「打不平」就是實行民主。依據中山先生的話：「中國第一決定要實行民主」；「中國革命，決定採取民權制度」，「革命的始意就是打不平，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無疑地，民主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了。中山先生常講「澈底民權」，「駕乎歐美而上的民主」，「貫澈革命主義」，「澈底革命」，那麼，這便不但是一般的歐美民主主義，而是以革命民主主義為其核心。

然而這樣的研究，還是抽象的，問題還欠了解。

第一、民族自決，在科學的意義上是民主主義的一部分，因為「民族解放，純粹是政治上的獨立權，是政治上自由脫離壓迫的一種權利，具體言之，是一種政治上民主的要求」。「全民族的任務，

即民主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這樣講來，民族主義，可以通俗地講，是對外的民主主義，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講演，要求推翻帝國主義的干涉與侵略，便是在民族獨立自由上把革命民主主義具體化，這是容易了解的。

第二、中山先生說：「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見民權主義）又說：「所以我們的民權平等，又要使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祇能帶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同上）所謂人人平等，祇能是形式的平等。不過民主的程度不同，在自由主義，形式平等離實質平等距離甚遠，而革命的民主主義，則形式平等可能接近於實質平等。中山先生曾說歐美民權祇利於「少數人的專橫」，中國的澈底民權，要在「間接民權之外，行直接民權」，並贊蘇聯民權制度「比代議政治改良得多」，則革命民主主義的本質，便是使民主形式接近於民主實質，所以中山先生說「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政治的打不平意義是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亦是容易了解的。

第三、「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或經濟的打不平，以及黨綱中的土地國有化，為什麼是民主主義的核心呢？這就不十分容易了解的了。

(A)「土地國有就是農民用革命方法來掃清一切中世紀土地佔有制與腐舊複雜的形式。」「中國民主派……的土地綱領，實際上是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

(B)廢止土地私有實現土地國有的根本意義，即在於取消絕對地租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

(C) 平均地權之消滅絕對地租，是對於封建專制進行決定的革命。以中山先生所謂「農民食國民革命的基礎，工人爲革命的先鋒」而言，平均地權的政綱，實在是後進國代替資產階級進行高漲的民主革命。

(D) 「在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地主壟斷土地的鬥爭，平等觀念是最革命的觀念。」「越是最限度地破壞農奴制度，最限度地達到土地分配平均原則」，越對於將來社會主義的道路掃清了阻礙。
(E) 「土地國有就是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的壟斷與中世紀的關係。」所以急進的土地政綱，不但是民主主義的高漲，而且是「民主主義的補充。」

據此，民主主義的核心，在客觀上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不但對於封建專制打「經濟的不平」，盡量掃除中古遺制，而且使資本主義最快發達，以民衆的保證，並爲社會主義前途清道路。

以上頗爲專門的理論，或難於把握，可參觀拙作「民主主義研究」(時事類編廿八期)及「民主主義偉大的理想」(理論與現實第二期)與黃松齡先生「土地農民問題的基本理論」(中蘇文化十月革命特刊)。

從淺近的方面而言，中山先生所作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圖，不是二者相等，而是前者多於後者，這多出於社會主義的範圍是什麼呢？我們除了由「民主主義的補充」去了解，再沒有方法說明的。因爲「民主主義是共產的實行」，祇有民主高漲，一面掃清中古餘毒，他面衝破社會主義的門戶，那麼「實行」的內容才具備了歷史，而「理想」才不是主觀性的東西。

我們不在這裏打官司，空辯論民主主義是否社會主義，我們祇就「共產將來，不共產現在」的遺

教而言，至少平均地權政策的初步核心，是革命的民主主義。

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之意義維何？吾人所主張者，並非如反動派所言，將產業重行分配之荒謬絕倫；但欲行一方策，使物產之供給，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的定義。余將使勞工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每一階級，皆依賴其他階級，而共同生活於互愛的情形之下。此種理想，固難達到，但吾人當努力以求理想之實現，以改良社會之情狀，使臻於完善之域也。依照此種計劃，生產將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窮困與奴役現象，以達到最高限度之生產，對於待開發之產業，人人皆得按其應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勞力結果之全部，獲得較優良之工作狀態。』（見陸達節輯孫中山先生外集七四頁）

所以節制資本的國家產業問題，是以「民主化」，或中山先生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謂「廉潔政府，人民軍隊」的澈底民權為內容，惟有這樣才具備到社會主義的橋樑，否則便流為中山先生所非難的俾士麥的『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見民權主義）所以節制資本政策至少在初步核心上，亦是革命民主主義。

或者有人要問，民主主義的核心，對於社會主義的前途不是分為二截麼？這是不了解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連帶性。要知道，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辯證的一致，社會主義可以『為民主主義作普遍戰綫的奮鬥』，而『惟有將民主幹到澈底，才能達社會主義的關口』；同樣的，『民主主義可以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見民權主義），但不是混同；而澈底的民主主義達到高度，就成為社會主義的保證

或順當的飛躍橋樑。

我們這樣的研究，完全是正確的。就三民主義字面的「民」之一概念而言，就三民主義內容中所謂「全民」、「人民」、「民衆」等概念而言，結晶點亦是真正的澈底的革命民主主義。中山先生亦說：

『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中外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叢書三，二五頁）

或者又有人要問，這種結晶點豈不是資本主義的範疇麼？我的答覆：如果澈底實行中山先生政治上土地上的民主政綱，固然使資本主義可以達到最理想的境地或最快的發達，然而一因掃清舊污，無中古生產方法所束縛，二因民權保證，盡量揮發民衆的積極性，則資本主義很快的發展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很快的結束，可能不約束於資本主義。因此，核心是「以建民國」，而不命定着與社會主義劃一鴻溝，可能「以進大同」。如果不了解這一「聯結」概念，處處都是爭點。

民主主義的高漲以及民主主義的補充，實在是三民主義的「集晶品」，缺少一民即非澈底革命主義。中山先生說：

『由於當日同志知道僅僅注重在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久是不能穩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同上，二二頁）因此中山先生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方法，亦有「積極的方法，那就是振起民族精神以求民權民生的解決。』（見民族主義）

遺教的核心精神——革命民主主義，是中華民族無上珍貴的歷史遺產，日本強盜就觸角到這一偉大的基石上，而迸出火花來燃燒了禽獸的觸角！我們紀念國父逝世十五週年時，「後知後覺者」的「實行」，應是實行中山先生偉大的這種理想！

民國廿九年三月

民生主義的科學研究

一 問題如何提起？

第一，目前對於民生主義的研究，無異說要把中山先生理論與中國社會發展，作為抗戰與建國前途諸要素相互作用之全鏈，加以認識。無疑的，這裏有一個前題，即我們對於發展的全鏈中之決定的環，要正確地把握着，換言之，就要「抓住抗戰」，如果忘却決定的環而空談鏈子，姑無論認識的正確與否，而問題却是取消性的東西。反之，如果問題是爲了堅持決定的環而須認識鏈子，那麼問題才有價值。因爲：「我們在各個瞬間，爲要維持全體並且堅決的準備推移到下一個環，就必須發見那不能不用全力去抓住的那個鏈子的特殊環」。

第二，團結抗日與團結建國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團結建國在理論上誠如中山先生所云「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好朋友」，那麼目前認識上的各種分歧任意斷言，便是有害的現象；中國國民黨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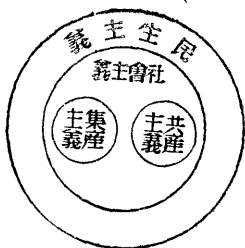
全國人士，應為發揚光大三民主義而努力。

第三，為了抗戰建國的基礎——「統一團結」的發展，共同奮鬥所遵守的原則必須有明確的概念。這不但是建國前途上所必須，而且是在現階段的團結信心堅定上亦所必須。

因此，民生主義研究的難題，便擺在我們深刻思考的課程中。自然，我個人的研究不過是一種單要的參考罷了。

一 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

中山先生用西文寫的民生主義，是 Socialism，並且說「兄弟把『社會主義』的原文譯成『民生主義』」，或說「這種主義（社會主義）就是我的民生主義」，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在「民生主義的說明」一文中曾用一個圖指示民生主義包括各種主義的範圍：



因此，又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由這些說明，我們理解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並不是困難的問題。

第一，中山先生對於那種和一般社會主義形成反面的資本主義，在許多講演詞中曾做了嚴厲的攻擊，其例甚多，祇舉一二於下：

「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用種種專制的方法，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

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民生主義，三六頁）

「英美內部還有很大的問題，他們全國的政權表面是在人民手內，但人民之間，有兩種絕大的階級，一級是極大的富人，一級是極苦的窮人。富人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願受少數富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那種反抗舉動，便叫做社會革命。」（全集第三卷，七五頁）

所以，他常說，歐美還要革命，推翻所謂富人的政權。中國「民權主義須要與民生主義連帶的解決」，否則，民權革命不是「澈底的」，不能「駕乎歐美而上」，還要「再來一次革命」。因此，他對於說中國祇有資本主義前途的人痛加批評，謂之「讀書糊塗」。「現在留心社會情形的人，多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用不着講社會主義。又有許多人說等到資本家發生之後，再去講社會主義還不為遲。這是太不得要領了。……難怪他們看着社會主義前途茫茫，不知從何下手，而且社會主義底真諦，不是專靠幾百本書，可以看得出的，必要有機敏底會心，確實的心得，才可以領悟得出來，我常說中國人讀書，越讀越糊塗，大概是這一類人。」（第三卷，四二——四三頁）

第二，中山先生既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那麼共產主義的實現，祇在可能前途上有着意義，而在距離方面沒有消除以前，共產主義便可以說是「理想上的」民生主義。（主觀性）我們很可惜不能讀民生主義的後幾講如養生、送死、民生主義結論等章。但先生所常提示的禮運大同全文，或此種理想。如果我們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之低級階段。我們在幾篇講演中，曾能大略看到同情於社會主義理想性的敘述。他說：

「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爲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會之真理，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爲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卽我民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國家矣。予言至此，極抱樂觀，理想一社會主義之國家，而其種種設施，再略言之。……國家有鐵路鑛業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勢。……（一）教育平等，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才力，各分專科……，教育之惠不偏爲富人所獨取。……（二）養老……垂暮之年，社會尙有奉養之責，遂設公共養老院。（三）病院……設公共病院，不收醫治之費。……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然其爲勞動則同，卽官吏與工人不過以分業之關係，各執一業，並無尊卑貴賤之差。……」（第三集，二六一—二八頁）

「他們（俄國人）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分紅利，像這樣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參看第三卷三七〇以下諸頁，以俄國人民幸福爲榜樣，而述「我國革命成功將來的情形」。）

「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同上，三六九頁）

所以，中山先生的偉大思想，不但沒有使民生主義在理想和社會主義劃一鴻溝，而且使民生主義具備了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性，雖然因了中國客觀上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迫使社會主義的任務居於前途可能地位，因而主觀性的社會主義滲透於思想系統中，可是如果由中山先生所謂「澈底的」民權革命的領導，主觀性却可以向着客觀性發展。所以，中山先生所謂的「要領」，就在這種發展，按「民

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講來，所謂「實行」，應在許多階段的發展奮鬥中去了解。把握不住實行要領的諸過程發展，就不能接近於理想。

「社會主義的設施」，不是一蹴而成的，尤其在落後的社會爲然，即以蘇聯而論，到了五年計劃時期，始能執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雖則說在過去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主導着。因此，民生主義在範圍上又不能不廣於社會主義。（參看前圖）

在這裏，我們就遇到一般人所解釋民生主義的歧異點，這種歧異論爭，不幸陷入古代「堅白同異」的形式對辯。（白馬是馬或非馬，堅石是石或非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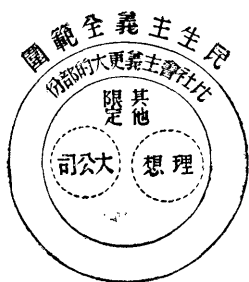
我們暫不論民生主義的客觀價值，僅由中山先生的圖解看來，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一部分，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更大的一部分。反之，如果我們按邏輯的講法，民生主義所以是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那是在「某種意義的限定上」而言，猶之乎「馬」在「白的限定上」是「白馬」。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要研究某種意義的限定。很明顯地，據中山先生的話，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那麼民生主義所以是共產主義，是在理想的限定上而言。所以他說：

「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

「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爲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够共產。不過我們所主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

在。」（俱見民生主義）



復次，社會主義既爲民生主義更大的一部分，那麼民生主義所以是社會主義，是在何項意義的限定上而言的呢？這裏並不是一種意義，而有多種意義。

1. 共產主義是在「大目的」「共將來」，「理想」方面而言，既在社會主義的範圍內，那麼理想意義的限定，無疑的便是諸限定中之一。亦即所謂「主觀性」的限定。且如上所引，中山先生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施，亦曾曰：理想。

2. 中山先生最常使用「發財」二字解釋民生，惟他說「不過發財包括了民生」。所謂發財，他說不是如歐美「富人因爲有了那樣多的財產，伊壟斷國家大事，無惡不作，窮人因爲沒有生活，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那種發大財的富人是少數，做奴隸的窮人是多數。在一個國家內，只少數人有錢是假富，要多數人有錢才是真富。……革命成功以後，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總而言之，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所得富足的利益，要歸多數人」。（第三卷，九四——九八頁）因此，中山先生又常用「大公司」一個概念，例如「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這客觀上是平等思想，是最進步的，最接近於社會主義。在這裏「要領」過程發展的意義，中山先生的話是「集產」，並不能用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把牠圖式化起來，全稱孤立化起來。

3. 在中山先生的文獻中，講到民生主義，便常用「預防」「防患於未然」「防止」等語以區別中國與歐美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例如：歐美社會貧富懸殊，「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尚無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不須提倡民生主義，不知民生主義則為思患而豫防，及今不圖，後將為患……且中國今日雖然沒有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同上，三二一頁）「世界各國，因情形各不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民生主義三五頁）「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採用馬克思的辦法（指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而「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亦即所謂「俄國革命後的政策與民生主義相暗合」之意。

在這裏，如果根據中山先生澈底的民權革命的「高漲」，「補充民主主義」，則社會問題確可以由高漲而至解決，中國固沒有歐美資本主義相似的前途，那麼這便是「高漲」充實了「預防」，預防是有現實性的。否則，若不堅決執行民生政策的民主高漲，而單用民生政策的消極預防意義，則預防便是一種空想。

4. 中山先生說：社會主義「梳西利甚」那個字，是從希臘文變出來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計兩個子一樣。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正本清源」。（民生主義，六頁）這是屬於最一般抽象的意義的，任何社會主義屬性都能包含的。

5. 關於工農政策。中山先生說：「一班工人不能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

，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曾把近代工人運動認爲是民權風潮的意義的擴大，擴大到整個社會組織方面，便是社會主義。他甚同情於各國的社會革命，例如說：「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贊揚俄國的革命爲「宏大圓滿」。

他論中國的工人運動，首先言明「中國工人，今天也跟隨世界各國的人，同世界各國的工人合作。」第二，中國工人是各帝國主義的奴隸，殖民地型的奴隸賤價勞動者，所以中國工人首先要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第三，中國工人既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而外，更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第四，中國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第五，「中國工人不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要實行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就要奉行三民主義。」（參看民十三年對各工團講演詞）

他對於農民問題說，「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甚麼責任。……農民是我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由農民來做基礎。……我們的基礎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第三卷四七二頁）又說，「現在俄國把全國田地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做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澈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其田，每年還是納田租，那還是不澈底的革命。」（同上四七五頁）

所以，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中國……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

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以期增進國民革命之實力，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帝反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

在這一點，中山先生的理論已經由中國社會的發展，取得更豐富的內容，已經超過辛亥革命的階段而發展了。除了「從事於歷史上進步事業的亞洲（民主革命）底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農民」而外，更產生了廣大的工人——中山先生所謂的先鋒。這個內容的發展，便使「中山先生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之革命的民主主義核心，發展起來」。

因此，這一最實在的農工政策之發展意義，成爲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連結與統一的契機，不但是「一種限定而已」。

以上五點，不過擇要提舉，此外如「平均」、「打不平」（指經濟，因爲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是打國家的不平，民權主義是打政治的不平，民生主義是打經濟的不平）等點，也可以當做限定而研究。

這裏所謂限定的意義，只在形式邏輯的範圍內而言，換言之，祇就中山先生社會主義的柔軟性之主張，確定其社會主義的諸方面的發展性。因爲中山先生的明白主張，我們不能曲解否認的，但不能強調的。

最重要的研究，還在當做社會主義圈外的民生主義部份，如何理解。

三 民生主義不約束於資本主義，「平均地權」

是「民主主義的高漲」

我們再把中山先生的圖解拿來考察：

除了民生主義在社會主義諸限定意義的形式範圍，即除了民生主義所容納的社會主義（如圖，小黑圈塊），尚有一個範圍，即如圖大白圈環，這個範圍是比社會主義更廣的東西，它作何種解釋？它的性質在中山先生的學說中有什麼規定？整個民生主義的這二範圍有沒有鴻溝隔絕？二者之間的連接在什麼地方？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沒有人研究的。

按中山先生最廣義的解釋，「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這一廣泛的說明，是整個民生主義的註釋，在那一個範圍內都可適用的。單由這方面是看不出問題的核心。

我們在這裏應當深刻研究的，是中山先生的「民生政策」（見民生主義），即他所說的解決社會問題兩個「辦法」：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這兩個政策是承認資產階級的法權：私產權利與勞動權利，因此，如圖在大白圈環內，兩個政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一，首先要明白平均地權這一土地綱領，是在歷史上用什麼政綱體裁提出的，在什麼革命階段提出的，它的原始意義究指什麼？

(A) 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之最初核心

我們如果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細心去研究共產主義」，那麼先生所稱贊的兩位該派主義的聖人的言論應該關心，我們研究民生主義中的土地政策更不能忽略他們對於平均地權主張的一個預言，一個評價。

我們反對曲解，主張要從中山先生主張的核心加以細心的深刻研究，要照整個中山全集中所明白主張的成句中尋求對於問題的解答。那麼以上的圖解中所指的比社會主義更廣的部分，應是：

要了解這種意義，我們須做歷史的兼理論的說明。

我們知道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思想構成的歷史，最初是以「平均地權」

這一土地政策提出的。據先生在孫文學說中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

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致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成也。」這時爲一八九八年，正當戊戌變政之年。但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俄國革命的一九〇五年，民生主義確尙未形成一個如後來的系統，到了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會綱四條（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



均地權)才具體以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提出，全文如下：「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同時據先生與宋漁父黃克強共擬之黨綱六條之第四條，曾把這明白規定：「主張土地國有」。

戊戌變政的主要意義，正所謂：「資產階級企圖照資產階級的方式，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盡可能地保持君主政體與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等等。」資產階級的「自由派」與反動地主之聯盟，使民主革命走向最不徹底的形式，杜絕了社會高級發展的可能前途，這在歷史上有着各種各樣的類型，英國式的與普國式的(日本維新是取下級的普國式的)等等。在中國，「不徹底的民主革命的途徑，已經不是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自己約束問題，而是民主革命的可能問題了。」袁世凱「已經把中國的歷史說明了。所以說：「和農民並列着的，就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牠的要人如袁世凱等一流人物。……他們看見了革命勢力，感覺到了革命的民主派底勝利，於是就背叛皇帝；後來，他們又會因爲和新的舊的『立憲』皇帝實行勾結而出賣民主派。」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沒有英國式的或普國式妥協前途，沒有自由派與地主用改良主義而「約束」自己的前途，而是祇有用最徹底的土地綱領始能完成民主革命。因爲「中國越落在歐洲與日本之後，便越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祇有革命民衆底英勇精神，才能『維新』中國，在政治方面創造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最快的資本主義的進步。」「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式的剝削底來源，就是他在各種形式之下被束縛於

土地，「祇有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才能「消滅封建式的剝削。」

中山先生正在戊戌變政的中國革命階段，以革命家的虛心研究態度，根據其「殊多心得」底革命的民主主義，已經和中國自由派改良主義分道背馳，實行澈底的民主革命。到了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時代，用具體的土地國有政綱，發揮偉大的革命精神。所以伊里奇會說：「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系統……是與急進的土地改革底計劃及宣傳相聯繫着的。……即與民主主義不同，而又爲民主主義之補充，」因而復把這稱贊而爲「偉大的中國民主派底綱領」，「沒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不能真正解說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因爲這種高漲激動勞苦羣衆，並使之能够完成奇特的事業，而孫逸仙的綱領，句句都是表現出這種高漲的。」

一九〇五年的同盟會土地政綱有着土地國有化與土地平均使用的兩種意義，所以一方面有「國民平等以享之」，「家給人足」的文義，一方面又有共棄「壟斷」，「增進者則歸國家」的文義，中俄兩國偉大的革命領導確有類似的意義，就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時候，這種民主革命的土地綱領也提出於俄國。我們把伊里奇批評考次基「冒名的經濟分析」一節詳細研究，便感到中山先生所以用「革命聖人」贊揚伊里奇者，原來是類似「火」字在諸葛亮與周瑜二人掌心中的暗合意識。據伊里奇說，土地平均使用是「使民主革命幹到澈底的意義」，進而「轉到共同耕地的必要」，（耕者有其田），換言之，「將這革命幹到澈底時，牠將更明顯地更容易地使民衆感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解決之不足，有超出其範圍而走向社會主義之必要。」考次基祇把這種平等思想認爲「烏托邦的與反動的，而不知道從民主革命的觀點上看來，這種爲平等爲平均而實行的鬥爭，是進步的與革命的。」復次，土

地國有的政綱爲什麼是更急進的徹底的民主革命呢？「因爲自由資產階級，不這樣就能保持最多的舊東西，最容易復古，」所以「如果不使這改良進行到在土地佔有制上去完全肅清一切中世紀的殘餘，……那就是擁護懼怕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土地國有化，可以消滅絕對地租（壟斷而來），只保留一種級差地租」，照資本論第三卷詳細說明，「土地國有，就是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的壟斷與中世紀的關係。」（此點另文詳述，對於了解平均地權，非常重要）

依據以上的分析，在同盟會的四大政綱裏，中山先生是一貫地表現出「徹底的」（見民權主義用語）民主革命的精神，所謂共棄「壟斷」，無疑地是消滅絕對地租，而由土地國有化，剷除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妥協；所謂平均地權，更無疑地是使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要求在農民中兌現，適應中國廣大農民對於封建剝削的革命要求。從同盟會的平均地權政綱形式上看來，那時亦還沒有社會主義的深厚色彩，我們應十分正確地把這綱領認做：「民主的補充」，或「徹底的民主革命的高漲。」即依圖所示，比社會主義更廣的部份。事實上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思想，最初亦是由民主革命的範圍內提出，並非由社會主義的範圍內提出。

然而，在這裏却要了解：所謂補充，所謂高漲，正是沒有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前途劃一個萬里長城，而是反把二者築立一種橋樑，使可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這不是中國落後的經濟所能命定住祇有資本主義的前途，例如考次基引用俄國農業經濟基礎而批判俄國革命者；亦不是一種跳過手段，例如託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廢除沙皇——建立勞動政府」。關於後者無待說明即能了解，關於前者，且引伊里奇的話如下：

「開倒車的考次基，現在冒名「經濟分析」，用「歷史唯物論」的驕傲語，來擁護工人服從資產階級，借用孟雪維克馬斯格夫的話，來咀嚼孟雪維克底陳舊的自由派的觀點；同時，他用這些引證來證明關於俄國是落後的新意見，而從這種新意見上得出的結論是舊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下不應比資產級跑得更遠！」

我們知道，「越落後的社會，到社會主義的程途中過渡階段越多」，因而另一個階段揚棄前一個階段的困難工作亦越多。所以忽略農民或土地問題的跳過手段是「左的」空談。我們又知道，「民主革命幹到徹底時，即接近社會主義的門戶」，所以約束於資產階級的死民主形式，企圖自由的妥協，亦是一種右的取消。

(B) 平均地權的綱領是高漲性質的發展過程

民生主義是由一九〇五年土地政策的這種意義之下發展出來的，它經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階段，更經過一九二四年前後的階段，使內容與形式產生着更完備的系統。我們所研究的資料大都是一九二四年前後的講演稿。因為中山先生說，這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全集第三集一六八頁）自然，這也是最後的材料。

中山先生大部份的民生主義都是講目前應做的任務，所以他的政策主要指的是：如何由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的階段，即私有權存在的階段，達於社會主義的階段。無疑地，要求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其最大限度是土地國有化，即消滅壟斷而生的絕對地租，應用平均地權政策幹到這樣徹底，便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要求私有權達於社會主義公有的發展，更是一列奮鬥的諸階段，而應需以節制資本

的政策所同時要貫徹的。

這一實在的政策是由現實的發展而來。他說：「要解決民生，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好像是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理想。」（民生主義，三八——三九頁）所以民生主義在「理想」上有其意義，在事實上抓住「實行」的「要領」，而求發展，更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他研究中國土地問題，首先防止壟斷。「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到資本家。」（同上四〇頁）這是講什麼呢？很清楚地是指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由土地掠奪始進入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近來歐洲的經濟風潮，一天一天的侵入進來了。各種制度都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上海灘的地價比較八十年以前，相差一萬倍。……所以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變成了富翁，和歐美資本家一樣，經濟發達，土地先受影響，不獨中國爲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各國初期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這種地價的影響，思患預防，所以要想方法來解決。」（四〇頁）

這裏所指高漲一萬倍的地價便是「絕對地租」，在歐洲資本主義化的絕對地租，是資產階級「不澈底的」民主革命所妥協的壟斷，因而革命出賣了農民。中山先生在中國「各種制度都在變動中」進行「駕乎歐美而上」的民權革命，首先主張消滅對地租而保存級差地租，以期開創所謂「民權主義與

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見民權主義)的步驟。

所謂平均地權的方法，即按照土地價格抽稅，地價由地主報告政府，政府可以依法收買土地，因抽稅與收買的調濟，地價可以依折中的市價報告政府。地價規定之後，再行高漲之價完全歸為公有。據中山先生云：這種高漲的價格，是由社會改良以及工商業進步而來，而其功勞還是衆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衆，不應爲私人壟斷。(參看民生主義五四頁以下)

按土地之肥瘠等條件而承認等級不同的地價，這是以級差地租而定的地價；取消地主因社會發達的條件而獨佔的地租，這是絕對地租。依價抽稅照價收買的辦法，一方面高揚土地的私有買賣市場的發達，他方面增進國家的公有財富。這樣的真正民主革命的高漲，可能使革命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耕者有其田)。民生主義圖中所指的大白圈環，即高漲部份。

因此，他說：「國民黨要由農民來做基礎。……這種基礎不鞏固，革命便要失敗，」不但不能實行「民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連帶的解決」之步驟，即連民權革命本身亦不能達到成功。

從中山先生的主張看來，上面所作的解釋，不但正確，而且是民生主義中所明白說明的。

「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我們怎樣能够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樣令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問題。前幾天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民生主義六五——六六頁)

所以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是達到耕者有其田的一系列奮鬥過程（從起點到最終結果），從土地國有化徹底的民主革命一直到社會主義的門戶。中山先生所舉的七個解放農民的問題（一）機器問題，（二）換種問題，（三）肥料問題，（四）除害問題，（五）製造問題，（六）運送問題，（七）防災問題，都是因了土地國有化，實行徹底的民主革命之農業近代化之發展問題。換言之，在未達到耕者有其田的階段，問題的核心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實行。然而據中山先生講來，這是「可以解決吃飯問題」的一部分，而沒有把它完全解決。因為按此解決，亦不過達到美國的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已，在私人資本主義構成之下，生產方法雖太發達，而民生問題却不能完全解決。但無論如何，農業資本主義化要素却是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發展。最後才必須達到耕者有其田的分配問題的解決，才能把「吃飯問題」完全解決。他說，這樣的便是以養民爲目的，而不是以賺錢爲目的。這樣，平均地權的最後結果，才從那以賺錢爲目的的資本主義，而達到那以養民爲目的的民生主義。爲什麼這是一個由徹底的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門戶之一列過程呢？因爲他說：「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對於資本制度，祇可逐漸改良，不能馬上推翻。」可是要使這種推翻在最初就有可能的容量，非實行徹底的民主革命——土地國有化不可。（參看民生主義第三講）

四 民生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橋樑

第二，中山先生在若干處所，講到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不是說與民生主義「暗合」，即是說民生主義實行於俄國，可見民生政策，尤其是節制資本的方法，和新經濟政策確有不同時代的類似性，這

是亞洲的落後性所提出的問題。中山先生說：「中國今後必須製造國家資本，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事政策……把大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如果要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民生主義五六頁）但中山先生却反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如民權主義中反對俾士麥），在階級未消滅之前，有一個目標就是消除階級拮抗，他說：「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不同。」（同上，五七頁）

什麼是新經濟政策呢？

「實際上，現在我們之前發生的事情，不是資本主義復活之一方面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兩方面的過程，是由社會主義要素去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過程。」

「新經濟政策是新國家的一個特殊的政策，它的目標是，把最高權限掌握在新國家手裏，這樣來空許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要素與社會主義要素實行鬥爭，使社會主義要素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的損害前面提高起來，使社會主義的勝利在資本主義要素上面得到確實的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可能建設起來。」

所以新經濟政策是二個要素的矛盾發展，而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有主導的作用。單有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或單有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便無所謂 *Step*。

「新經濟政策必須保存兩個方面，一以保證買賣之一定的自由為目的，一以國家的市場調節的任

務爲目的。任何一個皆不能廢除。」

新經濟政策還不是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不過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可能建設起來」。到了這一階段的末期始飛躍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五年計劃）。在新經濟政策中，伊里奇說：要使一切舊形式爲克服矛盾而服務，所以舉凡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爲空想的東西，形式可能性的東西，應用來可以變成實在的可能性，例如合作社；然而到了五年計劃時代，因了內容的充實，合作社的形式便爲新形式集體農場所揚棄。

復次，節制資本的民生政策，也是在理想上使資本主義要素和社會主義要素的矛盾之克服鬥爭過程，從中山先生的主張看來，一方面固然要發展資本主義的要素，他方面却還要爲社會主義的要素前途而作極大的努力，所以說它是一個矛盾克服的過程。這是不會有人懷疑的。由這一點講，我們可以說是民主政策是和新經濟政策有某些類似點。中山先生亦說：「俄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公司，在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取紅利，這樣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實際上中山先生所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四種方法（一）社會工業之改良，（二）運輸交通事業收歸國有，（三）直接徵稅，（四）合作社。在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前或施行中已經都成爲蘇聯社會建設的主要方法。在這裏首先要解答的問題是：

1.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他說「共產將來，不共產現在」，資本主義的私產法權是不能取消的，如果把這一意義強調，而削去社會主義的要素的前途性，那麼就有人會懷疑民生政策完全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反之，

2. 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主張，明明又確言國家公有資本的要素。如果把這一意義強調，而無視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那麼就有人會認為民生主義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建設體系。此外還有，

3. 民生政策雖與新經濟政策有某些類似點，但是新經濟政策是以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作為主導，一方面使資本主義的要素發展，他方面又克服這一要素。民生政策是不是亦以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作為主導呢？顯然不是的。這已經不是純理想的問題，而是要以中國革命的發展與領導的正確以斷的所謂「實行」的程序。

1. 我們假定問題確係如同新經濟政策的步驟，但問題亦不是順利的自然生成觀，而是要正確的領導奮鬥，克服左右「偏差」的錯誤，始能成功。所以伊里奇會說：新經濟政策的發展有兩個實在的可能性，即藉着勞動階級的改造農業的鬥爭，使蘇聯農業的發達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否則，就要遭受資本主義復興的前途。為此，伊里奇和左右兩個「偏差」觀念，實行過很大的鬥爭。在中國，這樣的問題，或者將要更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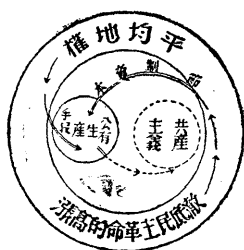
2. 越落後的社會，到社會主義的前途發展之階段性越多，這是一句名言。中國社會比之俄國更要落後，沒有俄國當時那樣資本主義發達的條件，所以，我們至少可以說，即使民生政策取得新經濟政策的克服性質，其本身亦要比新經濟政策的性質為更低，因而克服工作更困難些，奮鬥過程更艱苦些。

3. 節制資本的公有社會生產手段之發展是否可能，還要看平均地權的土地國有之澈底民權革命之勝利是否達成，這兩個政策的統一，更是一個較長的奮鬥過程，而且二者是不能不作連繫的發展看待。

的。如果澈底的民主革命的「高漲」，由正確的領導，達到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即由平均地權達到耕者有其田），那麼在打開社會主義的門戶以後，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很快地就可能取得主導的力量，它雖然是和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必要的發展，却不可如托洛次基把這認為資本主義的反動，也不可如布哈林把這認為無過程發展性的絕對形式，使資本主義復興）矛盾着，但却同時是以前者克服後者，以期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躍進。很多的人祇了解形式的形而上學，故在這矛盾的解決方面，偏差地認識，或如中山先生所謂「認為前途茫茫」，而不知道祇有把握住這矛盾的克服「實行」過程，才是問題核心的所謂「要領」。根據這一點講，節制資本政策的地位，是由民主革命的高漲才能進入社會主義的關鍵，以至社會主義的歷史，這樣一列的過程。它在圖解中是與平均地權的民主高漲地位同時並進，而又與之共衝破那個小黑圈的門戶，復在門戶裏發揮一個過程，始實行變質的飛躍，以進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達共產主義的理想。這便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奮鬥過程，亦即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真實意義（一個實行過程）。如圖所示：

圖中，「高漲」部份，是比社會主義更廣的東西，實線箭頭所指，是節制資本政策的活動過程，由「高漲」部分，衝進社會主義的門戶是過程的一個階段，再進而達於類似新經濟政策的範圍（公有生產手段發展的過程），是過程的另一個階段。虛線箭頭所指，是一種變質的飛躍，即進至社會主義的建設期，更進而達到衝破共產主義的門戶，再行變質。

如果把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全圖，依範圍的大小，由面的表示，剖成



勝利的諸條件及其各種條件的配合不同，因而中國民主建國的程度性亦不同；在抗戰過程中的中國社會經濟破壞程度以及由抗戰中自力更生的力量發展而為建國的力量，都是未可預測的，所以中國民生主義在將來民主建國的實行條件上便有種種高漲的彈性或曲綫。如果我們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而正確領導並確實執行，復參證友邦的「榜樣」歷史教訓，那種曲綫是可以縮短的，是可能由民主革命的高漲而達到民生政策撞破社會主義門戶之初步奮鬥，進一步解決資本主義要素發展與社會主義要素發展的矛盾。「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指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主義）；該民族不僅善於因自己長期奴隸狀況而痛哭，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還善於向那長期壓迫中國的人作鬥爭。」（伊里奇）

我們更可以說，在將來還善於由「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而為了實行民生主義而奮鬥。

（載時事類編廿八期）

民生主義的偉大理想

（一）民主革命使資本制度發展而不必「約束」於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的範疇，我們了解這一範疇，如果單從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剝削階級的存在

，還是不夠的，而且容易把資本家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社會構成與資本制度（或資本主義的要素）作爲同一類概念看待的。

第一，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是含有若干制度的，如資本制的，封建制的，甚至更落後於中古以前的古代殘餘，這樣的制度並存的社會組織，爲資本家的生產方式（獨占的私有生產手段與自由勞動者勞動力的結合關係）所主導支配着，就形成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構成。

第二，資本家的生產方式的形成與發展，並不是經濟主義的自然生成觀，而是經過歷史的變革運動，在歷史的資產階級革命長流中，資本制度的有價遺產如民主主義，可能不約束於資本主義，而其高度剝削關係的維持，如使資本制度與中古制度的妥協，亦可能取得資本主義的「約束性」。

第三，資本制度的存在，並不就是資本主義，例如蘇聯，因了工業的先進與農業的落後，因了農業須有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新經濟政策便在社會主義要素發展與資本主義要素發展之才盾過程中，具有了使命。然而爲什麼中山先生見到這種政策，不說是資本主義的復興，而強調地說這已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世界呢？並且更說「這就是我的民生主義的實現呢？」因爲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作爲主導力更要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

第四，封建制度的濃厚保存，並不能否定資本主義性質，例如普國式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因了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出賣農民而和地主貴族實行妥協，使資產階級的革命「約束」於資本主義。日本維新是普國式的最末級。

因此，資本主義的範疇，更須和資產階級的法權（私產權利平等與工資勞動報酬的權利平等）分

別認識，後者在其實現的歷史中，有很大的距離。

第一，資產階級的法權形式，即平等形式，固然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反映，而取得這種平等形式的歷史却可能有徹底的前途，即達到資本主義最理想的平等境地，換言之，把民主幹到徹底；反之它亦可能有自由主義的妥協前途。中山先生所謂俾士麥反對民權的第三障礙，就是這個前途，然而保存了封建內容的這一形式不是封建主義。

第二，這種法權的一部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還有存在的條件，儘管在內容上是變質的，而法權形式是存在着的。因為「還沒有消滅給不同人們之不等量勞動以等量生產品之這一資產階級的法權」。然而保存了資產法權的這一形式，是資本主義。

據此，資產階級的法權，在實現中還有歷史的特殊典型，我們應對於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與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以及二十世紀土耳其與葡萄牙的革命，作一個簡略的理論兼歷史的說明與比較。

第一，「不要把普魯士三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和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混為一談，也不要把他和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混為一談。……在英法革命中，資產階級曾為真正站在運動底領導地位的一個階級。無產者和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市民階層，或者沒有任何與資產階級分離的利益，或者還不成為獨立發展的階級或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凡在他們實行反對了資產階級的地方（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國就是這樣），他們僅僅為實現資產階級底利益而鬥爭，雖然他們所取的姿勢是和資產階級底姿勢不同。」（普魯士革命的總結一文）

所以，「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牠是一個純粹的等級的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撲滅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資產階級的統治，此種統治具有標本式的明顯性，為歐洲任何國家所不能及。」（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序言）

「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的這三年中，法國在迅速的，銳利的，集中的形式中，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有的發達過程。」（國家與革命）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英法革命，尤其是法國，所以是標本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統治，原因在於它站在真正領導的地位。這一問題，主要是，英法革命不是「約束」於資本主義，而是典型式的向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二，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另外的一種類型。一方面為「資本的發展所苦，他方面復為資本發展的不足所苦，為活的所苦復為死的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資本論序文）所以，德國一方面被包圍着世界封建的反動，他方面復產生了工農覺醒參加革命的新要素。

「普魯士資產階級與法國資產階級之不同，就在於它不會是一個擁護整個現代社會而反對舊社會代表（帝制與貴族界）的階級。它降低到某個等級底水平上，既與皇室對立，又與民衆對立，對於二者都抱着反對的情緒，對於自己敵人中的每個敵人都抱着不堅決的態度。它從最初起就趨向於背叛民衆以及和舊社會的皇室代表妥協，因為它自己也屬於舊社會之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沒有全世界歷史的使命。衆人唾罵的老頭子，自認為不能不為自己本身老耄計而指導強有力的民衆之青年志氣並且轉移這些志氣鋒銳。三月革命後掌握普魯士國家大柄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是如此。」（

普魯士革命的總結一文

所以，當資產階級「開始看到它的伴侶勝過它」的時候，「它便矢掉單獨的政治統治力」，而「在自己周圍去找同盟者，它依據情勢與同盟者瓜分自己的統治，或把全部統治讓給他們」（德國農民戰爭序言）這就是所謂後退妥協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以自由主義代替了民主主義。

其次，一八六六——七〇年的革命，是俾斯麥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由上而下的革命。」當時德國的資產階級竭力企圖政治的統治，而達到了統治德意志其他國家之翁克（即地主）式的普魯士，企圖鞏固民主勢力而反抗資產階級的發展，並想建立普魯士盟主式的民族國家。俾斯麥，據此，一方面拉攏小國家，減輕其預算，使爲全德預算所担負，他方面對於資產階級加以保障，以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所以，德意志的統一，在翁克式的普魯士領導之下，實際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又因俾斯麥政府利用之滿足民主利益，地主亦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法而改善過去的經營。同時他又對勞工階級玩以社會政策，擬定施行普選制，以及結社集會之自由。

這種由上而下的革命，一方面統一了德意志，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進步的，他方面却沒有「由下而上的改革補充牠」，使牠本質上成爲「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命令主義代替了民主內容，根據中山先生的話講來，「以國家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是民權的障礙」。（民權主義第四講一三〇頁）

「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認爲有這種可能（和平轉變），這無異於專制政體那裏摘去了它的無花果葉，而自己去掩蓋它的裸體。」

所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把資本主義的構成更約束於較高度的範疇，資本主義的進步，「不讓比資產階級跑得更遠」。

第三，「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俄國一切馬克斯主義者都這樣講。然以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斯主義的孟雪維克，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無產階級不能超出於資產階級所容忍的範圍。但馬克斯主義者說，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它企圖照自己的方法，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儘可能地保持君主政體與民主的佔有制等。問題是不應當跟資產階級以改良主義來「約束」自己，而使民主革命幹到徹底。……工農聯合，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將君主政體、中世紀制、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破壞到底。」（見「國家與革命」）

然而，俄國的資產階級更比德國落後，它更加和沙皇妥協了，但妥協的前途是不是唯一的可能的呢？不是的：

正如一八四八年所指示德國革命的兩個可能前途，在一九〇五年，上書的作者亦說：「只有兩條路，（一）完成「革命對沙皇政治取得決定的勝利」的工作，或是（二）沒有充分的力量得到決定的勝利，讓沙皇和極矛盾的極利己的布爾喬亞分子成立妥協。」

反之，考茨基不了解民主革命幹到徹底，就達於社會主義的門戶，只知道「約束」於資本主義，所以他的「經濟分析」便成了自由主義學說的斷片與卑躬屈節的鼓吹。

「開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冒名「經濟分析」，用歷史唯物論的驕傲語，……證明俄國是落後的，而從這新意見上得出的結論是舊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下不應比資產階級跑得更遠。」（「國家與革

第四，廿世紀革命的例子，『具有革命所得的「燦爛的」成績』的，是葡萄牙與土耳其，但亦是『約束』於資本主義。這兩個革命同時亦有另外的特點，即『他們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他們都不是民衆的革命，因為這兩次革命中，最大多數民衆都沒有積極而獨立的奮鬥，也沒有提出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的要求。』雖有成績，但決沒有如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與近三十年中國革命的偉大，因為『民衆大多數，在重重壓迫之下的社會民衆，都獨立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破壞的舊社會廢址上按自己的利益而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的整個過程。』（『國家與革命』）偉大的三民主義，應是這種企圖的領導。

（二）民生主義的發展國家資本，不一定約束於資本主義。

現在我們首先應研究民生政策與資本制度的關聯問題。

在中山先生的言論裏關於資本政策的內容，不但不否認資本制度，而且以最大關切而發展資本制度。

第一，發展資本制度的途徑——中山先生說：『現在英美各國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保守權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專制皇帝爲要保守他們的皇位，恐怕反對黨來搖動，便用很專制的威權，極殘忍的手段，來打消他們的反對黨，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專制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

，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爲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民生主義，三六頁）

歐美資本主義的金融蠶息系統，已經到了末路，然而中國的實業發展則正在青年理想的時期。所以：「歐洲的大總統都是資產階級的僕役或木偶，而這種資產階級又是腐化了的，從頭到腳遍身都是沾着污泥和鮮血。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後者早已拋棄了一切青春理想，……已經賣身給百萬富翁，資產階級化的地主了。然而亞洲的大總統（中山先生）却是革命的民主派，却是充滿了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概，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不怕將來，而是信仰將來，並爲將來而拚命奮鬥的；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臭爛和妨礙生活的廢物，而不打算爲維持自己的特權來圖謀保持和恢復過去的東西。」

中山先生的青春理想之一，即建國方略的實業計劃。他善於拋棄過去的廢物而又信仰將來，所以他說：「中國今尙用手工爲生產，未入工業革命的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并舉，既廢手工而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以營其鉅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鑛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建國方略七頁）

因此，先生有四種節制資本的辦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之收歸國有，第三直接徵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爲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民生主義二頁）其中中心問題在於國家資本，他說：「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我們的國家……要發達資本，究竟從那一條路走？現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過……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

興實業。……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來經營，將來也要產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同上五三頁）又說：『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共有之一法。』（建國方略一八九頁）『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防之道爲何？即凡……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此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建國方略，五頁）

據此，國家資本制度是中山先生發展中國資本制度的最高途徑，然而在這裏就發生兩個問題，（一）發展國家資本制度是不是「約束」於資本主義？（二）發展國家資本制度是不是就「居限」於國家資本主義？

第二，民生主義是『民主主義的補充』，而不一「約束」於資本主義——北伐宣言與北上宣言所載六條綱領的前四條有云：

- （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以后，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無疑的，這是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然而勞動農民與工人階級團結力之增長，是不是命定地要引之擁護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復古，而不與革命的民主派爲民主革命的高漲而奮鬥呢？宣言中亦說：

『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最終目的是什麼呢？按民生主義說，是「以進大同」，而「實行」之第一步是接近社會主義的門戶。

不但此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開首就說：『在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亦云：『一日造成人民的軍隊，二日造成廉潔的政府，三日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日保護農工商團，扶助其發展。』

無疑的這更是民權革命的最低限度政綱，是非常正確的。所謂過渡資本制度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正是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發展加以重視，而民生政策不僅限於初步，還有民主革命的高漲意義，決不能因此如考次基之論俄國革命，就認爲這是「約束」於資本主義，終局地形成資本家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社會構成，沒有『駕于歐美不徹底的，民權革命而上』（見民權革命）之前途。如中山先生所批評，『再來一次革命，使今日之革命爲徒勞。』（見民權主義）

什麼是民主主義的補充呢？第一，上面的青春理想之貫徹，即徹底掃除封建，不因自由派資產階級之誣爲「理想家」，而如德國俄國革命，取得中山先生所謂「太呆」的平等爲已足；或「不怕將來，信仰將來，並爲將來而奮鬥」的精神決不與封建妥協，割斷進步，決不自由主義在進步方向退後一步，「約束」於資本主義。相反地，正如中山先生所說，工人爲革命的「先鋒」，農夫爲革命的「基礎」，應使其「團結力增長」並「扶助其發展」，據而『將民主主義的合理的核心發展起來』。

第二，資本主義國家機體的特點，一爲常備軍，二爲官僚制，我們如『一造成人民的軍隊』，『二造

成廉潔的政府」(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曾有本質條件的說明，如「此種開闢利源的辦法，如不令官吏從中舞弊，則……中國人民必歡迎之」。)已經接近了巴黎公社式的所謂「民衆政府」，以及「廉價政府」之意義。所以，這樣的民主主義的補充，才使計劃經濟破除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然而真的達到這樣的民生政策的「實行」，則已經使民主幹到徹底，已經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而發展國家資本制度的結束，很快的可能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構成。

這是中國的民權革命的大衆政治經濟的要求，中山先生的理想正適應了這一要求而作「實行」的「理想」之領導、而示「理想」的「實行」之奮鬥過程。

第三、發展國家資本制度亦未可概念化而爲國家資本主義

(一)我們知道，中山先生的節制資本政策在民主主義高漲的階段，即在民生政策前段，是與平均地權政策相並「實行」澈底的民權革命，並不是俾士麥國家社會主義的再版，而是民主主義的「補充」，因爲一八六六年——七〇年的德國革命本質上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一種進步；所以恩格斯說應從「由下而上」的改革補充她。如果沒有這種「民主主義的補充」，那麼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不但是和社會主義對立，而且是限制民主的「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恩格斯語)，所以中山先生亦同樣地說俾士麥政策是「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民權主義第四講一二九頁)是「俾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而國家資本主義「使用國家力量去代替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成了民權的障礙」。(同上—三〇頁)節制資本政策在這裏，並不能從形式上國家資本主義去了解，主要在於否定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而代替以「澈底」民權的「補充」精神。祇有節制資本政策在階段中決定的一

環被堅決抓住的條件之下，才能够和土地政綱並行而達於社會主義的門戶。

俾斯麥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在本文第一段已講過，是把資本主義的構成更「約束」於較高度的範疇，是一八四八年「約束」的一發展。中山先生的革命的民主主義正相反於這樣改良式的自由主義，不但不爲普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所約束，而且復不能被資本主義所約束，而且根據「世界潮流與人羣需要」之發展而亦發展。所以中國的建國前途既沒有定型式的社會構成概念（概念僅需了解民主革命的高漲），而有極快發展的內容去充實，則偉大的民主主義亦不應概念化而爲國家資本主義。從理想上的共產主義而言（共產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主觀性，至多亦不過所謂使資本主義要素爲最快的發展，而無概念化而爲國家資本主義之必要。

復次，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表現於憲法上，正如李卜克所說，『不過是專制政體的假面具』，而以固定日耳曼各小國的存在以及日耳曼各小國聯邦州憲法爲基礎，想來實行把『所有勞動工具變爲公共財產』，這是一種『顯然的荒謬』。

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政策，雖是亦有「國家公用」，「國家所享」的規定，然這卻和普魯士的內容相反，正如第一代表大會所言，政治上的澈底民權革命，在經濟上需要資本制度的過渡。所以我們在客觀上內容相反的東西上，用形式上的概念說明不了本質。

（二）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代，有人亦把蘇聯的社會構成，概念化而爲國家資本主義，但這卻祇能混亂蘇聯社會的本質，而不能說明了他的內容。據伊里奇所言，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如有人要加諸蘇聯，傳不否認其存在，就是說毫沒有強調的必要。

中山先生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曾謂：「這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並謂：「民生主義實行於俄國」。據此，中山先生的民生政策，至少在理想上是欲以新經濟政策作「榜樣」。（見民生主義）但這種類似性，亦是以一列「實行」過程的民權高漲以破社會主義的門戶為條件的，不是取消了歷史內容而言，不是自我的無限發展而言。

所以，如果不確當於蘇聯社會構成的概念，更與民生主義的民主補充的內容作比較，亦嫌着離開問題的中心。

(三) 超出世界史上民主革命的土地政綱

什麼是平均地權呢？據中山先生說：

「土地要按價格抽稅，地價由地主報告政府，政府可以依法收買土地，地價呈報之後，再行高漲之地價完全公有。」（大意）

「這不過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民生主義六五——六六頁）

我們知道，中山先生的這一土地政綱，最早在同盟會時代提出，這一澈底民主革命政綱，最初就針對着他所謂「反對革命比滿清貴族更甚」的保皇改良主義。中國革命的深刻化，他的內容也就更發展起來。這裏，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幾種意義：

1 地價分爲兩種，一由差額地租而來的，這部分又分爲兩種所得分配，即歸地主私有者與歸國家稅入者，私有財產法權是被承認的，是農業資本主義生產化的發展條件。

2 二由絕對地租而來的，據中山先生說，「不能讓資本家壟斷」，（同盟會政綱中印有「壟斷」者，衆所共棄的文字），要歸公有，換言之，土地要國有化。這種消滅絕對地租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最大極限」不使自由派資產階級復古反動。

3 消滅絕對地租，爲什麼就有上面的意義呢？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曾詳細說明：「土地國有，就是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的壟斷與中世紀的關係。」此意，可參看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四〇頁左近的所論土地問題消滅壟斷各段文章。

4 中山先生的土地國有政綱，是一種民主主義的補充，字裏行間飽含「真正的徹底的高度民主主義的高漲」，並且，消滅絕對地租「將民主革命幹到徹底時，有超出其範圍而走向社會主義之必要前途」（耕者有其田），「民主革命徹底的意義，有進而轉到共同耕地的必要」。

5 因此，社會主義的鬥爭撞破之後，便達民生主義的「理想」過程，是民生主義的「最終結果」，起點是從平均地權的最初步發展着。所謂「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之旨。並沒有把二者劃一鴻溝隔斷，而是有「進」的前途，它由正確的農工政策的領導可能由上一決定的環轉入下一決定的環，當然環與環之間不是一句空話所能解決，而是一個奮鬥克服的過程。

6 因此，「中國這一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度所有的客觀條件，提出在四萬萬人民的生活日程上的，是……封建制度。……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式的剝削的來源，就是他被束縛於土地的這種事實。」

……所以中國民主派的……土地綱領，實際上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中山先生偉大的土地政策，以這樣地改變歷史而言，以民生主義所謂『共產將來，不共產現在』而言，以其『是共產主義的實行』而言，的確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補充。他方面是所謂『共產主義運動的特別原始的形式』。（參看德國農民戰爭）

所以中山先生以土地政綱爲中心的民主主義，具有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徹底性，更批判地克服了十九世紀德國革命的約束性，成爲二十世紀後進國進步運動中依據大眾政治經濟的要求而得出的革命理論。

（四）到社會主義之路，跳過呢？劃溝呢？衝破呢？

由上所言，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所謂三個打不平等的一貫精神，對外要求全民族的民主，直接民權的民主制度，民主革命的補充與高漲），依他自己的話講來，是『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相連帶的解決』，後來朱執信先生等發揮而爲『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並行論』。歐洲十九世紀以後的民主革命「約束」於資本主義，中山先生偉大的理論就要解決或克服這種約束。

第一，近代中國歷史，誰都知道包括着三個時代問題，以民主革命爲中心，向後反抗對外的侵略與掃除中古的舊制，向前迎接社會主義前途。最豐富內容的歷史，提供了偉大民族的中國。

第二，中國進步運動的限制性，更有以下的特點，一方面中國民主運動落在日本維新之後，不可

能有德國革命以後世界自由資產階級的保存古制或妥協維新之前途，祇有在廿世紀直向繼承法國革命的澈底解決；他方面中國半殖民地之落後社會，和其他落後社會一樣，到社會主義的階段越多，因而又祇有民主革命的高漲，經過革命的「實行」，而達於「理想」。所以中國抗戰建國的領導，既包括着三世紀的教訓，而復限制於一個中心——『澈底的民權革命』。（見民權主義）

第三，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因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黑暗與法西斯的侵略，不論在中國獨立自主本身或在世界光明前進中，更提高了中山先生抵抗外侮的「積極方法」，那就是「振起民族精神，以求民權民生的解決」。（見民族主義）同時，中國的進步上向運動正當着世界資本主義的窒息系統最嚴重的時候，一方面使進步運動的世界性更濃厚，他方面復使它向澈底的狹路更受條件的規定。

因此到社會主義之路，所謂「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相連帶的解決」，正是一列奮鬥的「實行」過程。爲了問題簡單化起見，我們且用三種方面研究如下：

第一，到社會主義的跳過理論——主要有兩種，一是俄國民粹派的厭惡工人階級的刪除歷史，在俄國封建廢址上建立社會主義。一是託洛茨基的拋棄農民的「不斷革命論」，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不斷革命，否認了民主革命的領導，無間地跳到社會主義。

第二，到社會主義之路劃一不可逾越的鴻溝——曲解理論而爲自由主義的人都是這樣，如考茨基論資產階級革命之不讓比資產階級跑得更遠，使革命約束於資本主義。「考茨基真是遭到了大不幸，因爲他信任了孟雪維克。說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考茨基，責備我們爲妄想走到社會主義的考茨基，自己在社會主義的假面具下提出自由主義的改良，不使這改良進行到在土地佔有制上去完全廢

清中世紀的殘餘。他正同於他的顧問孟雪維克，不去擁護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却寧擁護懼怕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國家與革命」）他認爲民主革命與到社會主義前途之躍進爲不可能。表面上則想實行『一些社會主義』、實際上則使二者中間嚴立鴻溝，使民主革命的範疇與資本主義的範疇等一。

第三、到社會主義之路，因了使民主革命幹到澈底，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遂以工農以兼的內容發展而衝破之。中山先生的駕乎歐美而上的民權革命，不約束於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補充，正是爲了這一正確的前途而領導。中山先生在這裏有兩種說法，一是消極的（或主觀的），即預防資本主義，或使貧富階級的對立防患於未然。二是積極的，即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後者客觀的價值充實了前者主觀的願望，拋棄了民粹主義的幻想。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一個具體的發展文獻。

在上面所言，我們已經包括了歷史的三個時期，一方面我們要善於拋棄中古腐朽，他方面則信仰將來。所以，這一前途，可能在兩方面作具體的領導，一打破十九世紀以後自由資產階級同封建妥協而「約束」於資本主義之太呆性，一「扶助工農的發展」而爲理想做「以進」大同的準備。中山先生關於二者皆有適切的遺教。

關於前者，土地政綱已表示明白，我們再從他的領導上來看：

「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也。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理想太低耶？」（孫文學說）

這是重要的事實，中山先生要「急宜行者即民生主義是」，以達「徹底的民權革命」，而當時不求知者却要步自由主義妥協之路綫，所以歪曲現實的妥協者便把中山先生革命的理论與他們「爬行的經驗主義」對立起來，說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馴至把屈躬於反動者命為「革命的實行家」（參看孫文學說中陳英士先生追悔書），而把革命的理论指導認做「理想太高」。所以中山先生會指明「以推翻滿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為吾人目的達到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民元，論民生主義一文）

中山先生深知辛亥革命是「無意中得之，不知而行者」，辛亥革命後復不能依據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建國，所以說：實行家「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闢，欲使後知後覺者，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

革命的民主主義在「徹底詳闢」，追求真知的運動方面，不約束於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的自由主義，從文化的意義上講，便是革命的人文主義。中山先生對於「維新」約束的否定，有精到的言論如下：

「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求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得，則行永無期也」。

中國革命不能約束於日本維新的妥協盲從道路，不能模仿日本維新，而是日本維新的一發展（見中山先生對日本記者言論）。所以中國革命必須求革命的正確領導理論與方法，而不是妥協實行家的

自由主義所能辦到的。到了民十三，他更進一步爲實行民生主義而改革領導機構，他說：「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爲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仿其辦法，也應倣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對黨員訓話）這一繼承革命傳統的領導，實在是「先知先覺」。他的批判的民主理論散見於民權主義中。在那裏批評了自由主義，批評了歐美民權革命的「太呆」性，批評了德國革命的不徹底性（如稱俾斯麥政策爲民權的第三障礙），高揚着法美民權革命的人類解放價值，更高揚着俄國革命的徹底價值，最根本地得出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連帶解決的結論。

關於後者，中山先生的精到言論甚多，祇引一段如左：

「國民革命之運動，必將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因此，中山先生在別的講演中，曾以農夫爲國民革命的基礎，以工人爲國民革命的先鋒，這一領導，不但說明對於民權革命的徹底性，而且說明了「信仰將來，並爲將來而奮鬥」的基礎任務，即衝破社會主義門戶的積極性質。這樣的中國才在民權革命的領導中，否定了資本主義的前途，跑到資產階級的前面，同時中國的歷史亦祇有依據道教的這一領導，才有創作性，中國歷史決沒有資本主義前途性，因爲普國式的「約束」在東方史是以日本維新爲了終局的延長。

正如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云，「過渡於資本制度」，這裏特別要明白，資本制度並非資本主義

的社會構成，而過。又不是資本主義的約束。

根據以上所言，我們更須了解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一命題。

(五)理想上的社會主義之發展

中山先生所謂「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按邏輯的講法，民生主義應是理想上的社會主義，因為「共產將來，不共產現在」。

但是命題亦有發展的，民元階段的命題與民十三階段的命題是有基本的差異。

在民元階段，中山先生高尚純潔的偉大革命思想之崇贊，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綱之客觀價值，為真正民主主義的補充或高漲，中山先生的政綱，代表了中國廣大農民的深刻要求。所以，民生主義之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或主觀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客觀現實性。中山先生之社會主義的講演，亦曾說「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為利國福民之神聖」。「社會黨……實行為社會主義之政策，實鄙人所深望也」。「今日之主張社會主義，實為子孫造福計也」。「予言至此，極抱樂觀，理想社會主義之國家，而以其種種設施，再略言之」。

然「歡迎」「深望」「為子孫造福」「樂觀理想的」的客觀的革命精神，却為當時人所不了解，祇在表面上以「理想家」譁蔑先生，而企圖實行家的自由主義。

這時，脫過資本主義的約束，而求社會主義的前途的問題，還沒有在社會實際中佔有位置，因為

還沒有「民主核心的發展」所應具內外的條件。

然而到了民十三年前後就不同了，外面產生了中山先生所謂「世界人類生出一個大希望」的戰國革命，內面中國工農政策的基礎發展達到成熟，因而不但使民權革命的澈底核心問題壯大起來，而且使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實際上具備實踐的意義。

因此，理想上的社會主義更進一步成爲民元階段的發展，這不僅在民主主義的客觀意義上更有充實的內容，而且把社會主義的主觀性可能發展到其客觀性的橋樑，亦具體地提出來。

這樣，在民十三年以後，國人又產生了一種毛病，不注意民主主義的高漲，而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理想，甚至把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設置一個等號，民元的實行家又變成了民十三的理想家。

所以關於中山先生理論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的範疇上，我們應從時代的觀點了解多於民元階段的東西，那就是除了本質上充實革命的民主主義客觀性而外，還增加了社會主義主觀性到其客觀性的橋樑之意義，卽由實行以「進」理想。

末了我們要這樣的說：

民主主義不「約束」於資本主義，我們要了解民元階段的上向青春理想，更要理解民十三階段的更上向的青春理想，卽『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二重性質，『澈底的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前途。然而二者間沒有鴻溝，由正確的領導可能使二者達到實踐的統一。誰不了解這個關鍵，誰就會割裂民主主義的偉大理想。

民主主義是理論，是領導行動的指針，不是經濟主義自然生成的一個生產方式，它根據歷史的現

實發展，可能領導着不約束於資本主義，並衝破社會主義的門戶，它也不能違背現實的發展，跳過民主權革命。所以，民主主義是客觀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論領導系統，這一系統不是就鉗入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社會構成，誰要這樣理解，誰就是把理論系統與資本制度混用了。

我們知道，新經濟政策內容裏有資本制度，然而新經濟政策的理論系統的領導，却不是如布哈林的觀念——恢復資本主義，相反地乃是一種「誰勝誰」的到達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領導。

相類似地講來（不是歷史的同一），民生政策內容裏有資本制度，然而民生政策的理論系統的領導，却也不是如一般人的觀念——約束於資本主義，相反地乃也是一種「誰勝誰」的衝破社會主義門戶的發展領導。

因此，理論的系統（Theoretical system）對社會的制度（Social system）不是一個形式邏輯的同一，誰要不從發展的進步概念去了解，誰就會對於偉大的理想加以誣蔑。

民國廿八年二月。

關於民生主義的研究方法問題

——答錢俊瑞先生

在這篇短文裏，我並不想把整個體系以及枝節的辯論提出來，我祇把方法論上與歷史認識上的

一個核心的「分歧之點」，說明一下，就教於錢先生與讀者。至於內容，我在準備將一年來時作時止的一篇論文「三民主義的核心」，寫成一個積極的研究，發表我個人的東西；我因為材料與說明形式要說的話很多，也無力各方面顧及消極的批評，且也在我文章裏向來沒有敢於補充或修正各位理論者。

未入正題之前，我仍然想有幾句多餘的話：

一、我一向寫文，不是信筆所之。因為我的謹拘的性格常讓嚴正的方法論所籠罩着，所以時常在文字中間缺少活潑性，甚至酸晦到斷片簡括的不滿自己的意思。例如「共產主義運動的特別的原始形式」一句引語，我應該發揮孟彩爾的「萬年樂土」，用形式可能性到真實可能性的說明，把思維過程史作一個具體的介紹，同時把十五六世紀農民戰爭民主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意義明顯地提出；但沒有寫出來，而祇一筆交待，這是我的懶惰（或者說是苦衷），以致錢先生「感覺」到我的「態度」什麼「化」了，甚至把歷史的鑲鍊，理解而為一般的同一，評我為「未免超階段」。然而正確的講來，在錢先生「恐未免超階段」的流於高價估計，這在我不論當時執筆或現在寫文，都恐未免把中山先生太低價估計了，因為這引用語應當適用到太平天國的「特別原始形式」（在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引伸一點講來，更為適合）。我們知道，特別的原始形式一個概念，是思想史過程中的常見文句。例如海列克里特斯是一種特別的原始形式，到了海格爾更是另一種特別原始的形式，這萬萬不能和「合理的核心的顛倒」者，混為一談。這在我並沒有「自我」聯結去，反而我恐未免錢先生「自我」「感覺」起來。

二、我深信着這個名言的難處：「必須要強調那被所攻擊的主要原則，於是就沒有更多的時間，

地方，和機會，來使其餘的交互作用的諸契機獲得它應得的地位」。因此，我要發表自己的認識，自然就一方面「着重的原因……也要負責任的」。關於這一點，我沒有用錢先生的方法論「甲是甲」，「乙是乙」，「馬克思是馬克思」，「孫中山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還給孫中山，把馬克思主義還給馬克思」（見理論與現實第三期錢文）。因為第一，形式邏輯和機機的還元論，不是通理，第二，任何人除去歷史的發展概念，都不可能做出「還元」工作，第三，「甲是甲」的究明同時便有「甲不是甲」的說明，就是說三民主義者現在「不妨礙嚴格批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妨礙批評三民主義」（用錢先生話），但我沒有着重這一點，而讓有時間，地位與機會的人去討論，這是我抱歉的地方。

以下，我要簡略地提出一個主要問題，請教於錢先生。

錢先生不同情誰化誰的原則，我是謹守着的，因為這是常職，倒不是所謂「歷史的「命運」所規定的」。照一個「自我」規定，「甲是甲」，「乙是乙」，把思想過程史的聯結性分裂成考茨基式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理論，就不僅是「半自由主義者」的持論了。例如錢先生說：「甲是甲，乙是乙，國家資本主義儘管是社會主義的前身（？），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準備階段，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儘管已經（？）沒有什麼中介（？）的東西，然而國家資本主義決不是社會主義，」（同上第一期）在這一段使人看了甲是甲，乙是乙的難以捉摸的文中，有何「感覺」？我個人不明白「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前身」，因為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甲是甲），這一斷言已經大成問題，同時又說「已經沒有什麼中介」，為什麼說甲不是甲。好看的一段形式邏輯！在這裏，我不再非難錢先生

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僅僅是舉例來究明錢先生的方法論的本質。因了上面的方法，錢先生是誤解了「生產方式」，他說「國家資本主義決不是獨立的生產方式，它必須依附於某一種主導的生產方式而存在」。既然甲是甲，則生產方式爲什麼不是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主導呢？爲什麼要適合於自己的邏輯，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依附性質，移植於國家資本主義？「特殊的」資本範疇，很少見的，請參看拙作社會史論導言（中蘇文化四卷三期）。錢先生研究民生主義的主要結論是國家資本主義，不能以「另一問題」而遁其詞。

我要在這裏抄一段話：『「民衆」革命這個概念，在馬克思嘴裏說出來，似乎有點奇怪，而俄國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和孟塞維克……也許認爲是一種「語病」。他們……以爲除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對立而外，其他什麼都沒有的……如果舉二十世紀的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當然也要承認其爲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兩個革命都不是「民衆的」革命，因在這兩次革命中，最大多數民衆都沒有積極而獨立地奮鬥，也沒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獲得葡上的……「燦爛」成績，却是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在說到「真正的民衆革命」的時候……他們毫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的特性……』

「取消常備軍，一切官吏之完全選舉和罷免，……事實上僅僅表示以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機關來代替舊機關的一種偉大改變，這種恰恰可以看到「由數量到質量」底情形之一。」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是一種「簡單的」幼稚原始的民主主義之要求……他們完全

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非有相當地「回復」到「原始的」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

「巴黎公社，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廉潔政府的」口號。因為他革除了國家的兩大支出——軍隊和官吏。」（上面引文全是巴黎公社史論）

讀了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錢先生非難我超階段的輕率斷言，固然失於微點，而把我強調的聯結性（國家資本主義不是本質），認為過火，當亦不僅「過火」而已，而是錢先生否定歷史的聯絡（經濟主義）與忽視政治的主觀力量的估價發展（客觀主義）之必然推理。在我認為，如果「一造成人民的軍隊，二造成廉潔政府」的中山先生的偉大政綱實現，為什麼不可以說是已經取得巴黎公社式的所謂「民衆政府」以及「廉潔政府」之意義呢？為什麼要「甲是甲，乙是乙」把歷史劃一鴻溝？「民衆」「廉潔」二字原文都是斜體字，最不常用的，不可拘泥為社會主義。中山先生發展的澈底民權革命（加土地政綱），與工農政策的配合，可能達到聯結的頂點，在範疇上能認為不是民權革命的階段麼？巴黎公社正是民主共和國的頂點，祇有利此，才能入社會主義之門戶，然而錢先生又把公社國家與民主共和國劃為二段，此不了解「民衆的」與「工農的」區別，因此錢先生把「民主主義合理核心的發展」與其「完成形式」惟恐聯結，才認為我所提出的聯結概念「混為一談」。「分歧之點」就在於「甲是甲，乙是乙」。

我認為錢先生並沒有在理論的關鍵處強調「祇有澈底民主的高漲才能保障民主主義之過渡到社會主義」錢先生的「優點」，正是和我時常所指出的「由實行以至理想的」下列奮鬥過程之「民主革命高漲」相同，但我着重在中山先生土地政綱的民主主義的歷史本質，而錢先生則在國家資本主義一個空虛的

範疇中尋求事實，這亦是一個「分歧之點」。

社會主義的主觀性方面的優點，就在於和自由派的妥協路線對立，而不妨礙到客觀性的發展。同時這優點就是和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高漲與補充（前者爲工農政策後者爲土地政策）形成現象與本質的統一物。但因了錢先生的「甲是甲，乙是乙」，又把現象與本質看做絕對的分裂東西，也沒有看到現象向本質的互變。我在科學民主主義研究一文圖表上會缺少綫條說明實在是一個缺點，然強調外圍的民主性以及過程發展，則尙守着真理，而錢先生論本質一文中的加號（十）則是否定發展的機械學的引伸（雖然在後來討論中註上「統一」二字），我認爲這是真實的「弱點」。

所謂「由實行以進理想」，我祇着重「進」的方面，「主觀到客觀的飛躍」，也祇着重在「到」的方面，民十三增加了的東西，也就是向前接近一步，而本質便是更使民主高漲了一步，政綱的價值是不能否認的。但錢先生則又用「甲是甲，乙是乙」的鴻溝，把飛躍發展與聯結的關係否定了。在這裏，容易誤解到誰化誰。我不敢根據客觀主義，把三民主義還給興中會時代，或民元時代，或限於民十三時代，但也不作主觀主義把三民主義完全理想化，我着重的是研究發展的過程以及克服矛盾到將來前途的政綱領導。

在理論與現實第三期編者先生的聲明中 謂有幾位朋友對於第二期拙作有所批評，這是作者所感謝，深願以虛懷領教。錢先生「認真和作者討論」的意見，除了感激而外，我也認真地把我的意見寫出來，向錢先生請教！（本文載理論與現實一卷四期）

民權主義的理論與建國

一 民權，民主，民治：是一個名詞：德模克拉西（Democracy）

民治，民權，民主的翻譯文字，都是由日文裏介紹過來的，都是「德模克拉西」的譯語，有時亦譯做民治主義，民權主義，民主主義。在「五四」時代，有人直接音譯做「德模克拉西」，因和「塞因斯」（Science）並提，故有人把前者簡名「德先生」，後者簡名「塞姑娘」。

中山先生說，所謂民權「德模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民權主義第二講九二頁）。『凡事都是應該人民作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第五講，三四一頁）。所以，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在中山先生學術中是異名同實的概念。『民權是人民去管理政治』的意思，所以便含義民治主義一概念，但中山先生的分類有「政權」與「治權」之別，為避免概念的混同，故不使用「民治」這一概念。此外，在中山先生的意思，因了進步的民主主張，是不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或民治混同，須要另立範疇，所以在中山先生的學術中採用民權用語，而在廖仲凱先生的譯書中則採民治用語。近數年來中國論壇中的譯文或用音譯「德模克拉西」，或用意譯「民主」，這不是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顯示異途，而恐怕因為中山先生把「德模克拉西」含義規定了很多具體的新屬性，形成一個新的系統，不便混駁之故，其實在義諦中並不是相背立的東西。形式的問題，不是問題的中心。

二 中山先生對於民權(民主)的歷史觀點

我們知道，民主是有歷史內容的，是發展的，不是一個空虛的抽象絕對物，亦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物。歷史上有古代式的民主，有近代式的民主，有蘇聯式的民主。由低度的狹隘的民主，發展而為高度的接近於實質的民主，是一個歷史進化運動。世界上沒有完全的民主，如果達到民主的實質點時，民主就成了博物館裏的東西了。

古代的民主是奴隸制的民主，是少數貴族的民主，所以中山先生說：

『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為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第三講一二二頁)這是古代奴隸社會貴族專政的民主，極其低度的民主。

嚴格地講來，民權或民主，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平等思想是商品生產關係的反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方面是歷史的最大進步，他方面則局限於民主的虛浮性裏，『依照其本性，對於一切平等問題，慣用着抽象形式的態度。資產階級聲言無產者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暗地裏則欺騙被壓迫者。』然而這不是說，『爭取民主制鬥爭會是根本的錯誤』，『相反地，若不將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則不能準備自己去戰勝資產階級』。尤其在法西斯把資產階級的民主統級的現階段，保障民主的鬥爭實成爲世界人類的共同課題。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各講中，極力贊揚歐美的民權革命，稱之爲這是「順應世界的潮流」，稱現代爲「民權的世界」。在中國，他說，「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然而，中山先生並非自限於資產階級的形式的民主，不但沒有故步自封，反而給與歐美的民主制以嚴正的批判，鄭重地批評了資產階級民主之狹隘性，他說：「照現在世界上民權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不過是一種代議政體。」（第四講，一三三頁）這種「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止境」（同上）的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中山先生稱之爲「流弊」，因爲形式的東西，距離實質很遠。這種「流弊」傳到中國，他說祇產生了些「豬子議員」（同上），更沒有內容了。

歷史的車輪無止境地往前飛奔，形式的民主不能不受否定，所以中山先生進一步說，「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註；意指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政體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推想這種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同上）

由這幾句話，看出中山先生的政學精神非常虛謹，但他的偉大推斷却又十分正確。我們現在所得到的材料已足夠了解其民主的進步高度性，在前十數年這種材料確是沒有的。據列寧說，這種制度比代議政體（資產階級的民主）進步了「一百萬倍」，還可以作中山先生推斷「改良得多」之具體註脚。這一距離實質更近的民主制，不是如中山先生所謂的少數人的民權，而是廣大多數人的民權，然而這也祇能如中山先生偉大的思想推斷「改良得多」，不是如資產階級的形式觀念下的所謂「一般的民

主」。

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世界」，現在已經受了極大的威脅，法西斯將使世界歷史回到中古農奴制的黑暗境域，牠把形式的民主也絞殺以盡了，不但是一種「障礙」了，民權鬥爭更具備着現階段的特殊任務。而爭取民主的進步意義，已經明白揭示於民權主義裏面。

資產階級的民主，據中山先生說，「在歐美雖然過了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够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一八三二年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美國民權運動開始後，「歐美自法國以外，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中也發生民權風潮。」（第四講，一二六頁）至於德國一八六六年的革命，本質上是所謂「由上而下」的改良，他是一種進步，所以說應從「由下而上」的革命補充牠。因為一方面俾士麥的改良政策許與工人階級以某些民主權利，他方面復利用「官僚主義約國家集中制」而限制民主權利，這一後者的限制意義，用中山先生的話講來，便是「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第四講，一二九頁）。同時中山先生一再說明這是「俾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或「使用國家力量去代替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成了民權的障礙。」（一三〇頁）

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一種形式的狹隘的民主，所以中山先生說：「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說來，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爲什麼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够向正軌道去走……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爲民權去奮鬥。……工黨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最初工人不知道自己處於不平等的

地位，不知道受資本家很大的壓迫，後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與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裏頭，把他們才喚醒了。」（第三講，一一三頁）

所謂「太呆」的平等，是指資產階級的法權，這有兩個意義，「無產者與私有財產者在法律上的平等」，二，「不同的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不等量）勞動被與以等量生產品之平等。」前者即私產法權，後者即工資勞動法權。資產階級把此等法權形式化一般化，稱之為「純粹的民主」，形成一種騙局，既然沒有充分發達到內容的正軌上，就不能說是做到澈底，因為誠如列寧所說「民主做到澈底時便接近社會主義的門戶了」，所以這平等是「太呆的平等」因此，中山先生才說：

「德國的民權雖然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俾士麥的執政時代，他的能力，不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種種方面戰勝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衆」，然而所謂「民權第三障礙」的俾士麥獨裁又如何呢？他說：「到了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另外發生一種東西，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的民生主義。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發達。社會主義本來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到達的。」（第一二六頁）這一論旨正和馬克斯論法國革命與德國革命的前途相同，民主革命的充實，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這一點，三民主義不但不約束於資本主義，而且把「進化史」的形式化，正是東西革命導師所反對的。

民主「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而是向富人的民主方面去走，因而經濟戰爭的社會主義便復在歷史中發揮時代任務了。中山先生說：「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

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亦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自然這裏所謂推翻了的是指從前的封建貴族。「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的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第三講一〇七頁）

這樣講來，俄國革命便是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或「同時達到」的革命了。因此，這不但沒有把平等弄得「太呆」，而且比資產階級的民主「改良得多」。牠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一部份太呆法權，私產法權，雖然尙保留着資產階級的他部分法權（形式上還是呆一點），即工資報酬制度，可是工資已經成爲各分子間生產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內容上早已不是「呆」的了。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已經實現於俄國，祇怕是指這一點精神吧？

在今日，民主制度，因了法西斯戰爭的瘋狂，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問題，有的國家如中山先生所謂成功最大的國家蘇聯，應當發揮積極的民主制度，模範的「不呆」的民主精神，有的國家如英法民主國家，應當盡量地爭取較寬大的充分的民主，有的國家如法西斯德意日，應當爲保障較狹隘的民主制度而奮鬥；再如中國，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在抗戰建國過程中，應以內部民主的建立而爭取外部民主的獲得（獨立）所建立的新式的民主，雖然仍是資產階級法權式的民主，而本質上的發展却要求「不呆」的內容，如中山先生所謂「駕乎歐美」資產階級民主而上之民主，中山先生既云「中國決定要採取民權制度」，那麼同時便不得不爲充分的民主而奮鬥。

三 民權（民主）是進步的不是抽象的類概念

中山先生的民權論，不但沒有局限於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假象化於進化史的形式抽象中以及其騙局中，反因為「社會主義與民權主義相連帶」解決之進步認識，使民權論發展了。

在初期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這不同於現在在別的姿態裏故意製造）恆常把民主認為一個抽象的類概念，靜止的不可超越的絕對物、先天的範疇。例如盧梭的絕對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是由其「人性論」的絕對的天賦自由平等觀念出發，這和亞日斯密士從「人性論」自私心出發的自由競爭之經濟理論是如出一轍。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如法蘭西的機械唯物論與英國休謨洛克的哲學，形成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理論，故當時的政治哲學與經濟哲學亦祇能在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方面參加意識的革命。這種「毫無顧慮」的素樸態度，可以說是科學的態度。他們爲了使資本主義絕對的合理，所以在意識上亦建立起忠於自己的絕對的類概念來，這對於當時的革命是忠實的。所以中山先生的批評如下：

「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成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我們所主張民權的，不必先主張言論，因爲宇宙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有言論。」（第一講，八三頁）這一接近於現實發展與理論發展的道理，足夠批評「天賦權利」（八三頁）說的局限性。中山先生以爲中國所以「決定採取民權制度」者，「一則因爲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因爲縮短國內之戰爭」（八六頁）因此，民主內容是可進步的，是可以變質的，不是一個先天的範疇。

中國的「經濟分析」者沒有了解到這裏，因而把民主規定成一個不可逾越的東西，然而這與中山先生的理論是沒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雖然在正確的理論上反對形式主義的民權論，可是在人類進化史上却對於這種民權主張給與極大的推崇，贊美「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關於和民主範疇相為連帶的自由平等認識，中山先生亦有精闢的見解。自由平等，也和民主一樣，不是形式和內容一致的東西。民主不過是「形式上的平等」，由形式上的平等，逐漸發展而為且有更多內容的平等，接近於實質的平等。世界上絕沒有純粹的自由平等。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却把自由平等規定為絕對的東西。中山先生在理論上給與了以下的批評：

「少數有智識學者……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之後，民衆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第三講，一〇四頁）

其實，平等只是形式的東西，是人為的平等，「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使世界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一〇五頁）

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無產者與私有財產者祇有法律上的平等，同時自由勞動者的報酬亦只有在事實上、不平等勞動上給與等量生產產品的分配，所以資產階級的全部法權是形式的平等，中山先生稱之為人造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列寧叫做政治的民主）。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前一資產階級的法

取消（逐步的，還不是一舉完成的），後一資產階級的法權尙未取消，故「盡能取值的社會，還有不平等內容的形式平等，」或政治地位平等。到了「盡能取需」的社會，才能使平等自由更接近於實質，然而到了這時，一切民主，自由，平等，却已經隨國家機器的消滅而也消滅。因為「民主本身是國家形式之一」，這時只有在博物館裏找民主、自由，平等。中山先生的主張，既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同一性與發展性，那麼民權學說的發展當亦有這樣的內容。

一般的抽象的平等，中山先生稱之為「假平等」，根據事實發展而來之政治平等才為「真平等」，所以他畫了兩個圖來表示其間的區別。近來有人說中山先生反對平等，這實在是一種誤解。

我們不能跳出我們的自己歷史範圍，而懸空企談高度民主，同樣地也不能不如中山先生所言，「中國革命決定採取民權制度」，這種制度，又誠如中山先生所言「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平等。」因為中國建國既不能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權任何一部分，則建國民主只有擴充民主的內容，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所限，要「駕乎歐美」而上建立「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民主發展機關，因為中山先生常說，「革命的始意就是打不平，到了平等以後便了事」（一〇三頁）。又說「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列寧亦說「民主就是平等的意思」或「形式的平等」），平等是有發展內容的，不是不可逾越的東西。

復次，中山先生對於浪漫的自由甚加非議。反對極端個人自由主義。這有兩個道理，第一，自由主義和平等學說不同，平等是有所謂「民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可能，而個人自由主義却祇是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方面的。我們的時代和十六七世紀不同，若強調資產階級的自由浪漫主義，

則本身便局限於資產階級的範圍以內。民權便成了不可超越的東西了。所以中山先生說，自由遠不如發財這個口號來得切實，「三民主義又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按即戰時共產主義）是和發財相近的。」因為我們的任務不僅發財，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九六頁）中山先生既主張民主平等，當亦主張民主自由，即政治上的平等與政治上的自由，但却反對個人放蕩的小資產階級性的自由，無紀律的浪漫散沙行爲，故依據了中國社會落後性而強調組織的集團嚴肅力量。所以中山先生重視政治上言論結社自由，而說「自由的解釋，簡而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够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

第二，中國是被壓迫的民族，首先要爭取的是民族解放。所謂民族自決權。即「純粹是政治上的獨立權，是政治上自由脫離歷史束縛的一種權利，具體講來，是一種政治民主的要求」。「全民族的任務，即民主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所以爭自由首先從國家的自由起，中山先生亦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爲國家爭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要用到國家上去」。（第二講，一〇〇頁）又說：「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要把我們的國家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的主義不可。」（一〇一頁）目前，統一團結力量，答覆日寇的侵略，我們應如何根據遺教，「集合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用革命的方法，實行革命的主義」！個人的自由，黨派的自由，階級的自由，皆應服從於爭取大團體的自由。這是中山先生以團結爭取大自由的民權理論，值得我們現在萬分注意的。

個人主義自由，在中國是應當削弱的！反之，民主抗戰的民族自由是要爭取的，民主建國的政治自由是要尊重的。因為法西斯便消滅大眾的政治自由，而遂行大資產階級的少數政治極端自由——從金融寡頭到個人獨裁。

中山先生批評俾士麥式的政治為「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為「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稱為民權的「第三障礙」；法西斯的獨裁，根據中山先生的民權論看來，不但是民權的障礙，而且是民權的死刑了。

法西斯的大資產階級少數的政治自由，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多數政治自由對立的，有人說二者皆沒有自由，那是形式論。

四 中山先生民權學說的進步性

一，中山先生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並「沒有充分的」民主，「人民仍然繼續要為民主而奮鬥」，所以中國民主要求超出歐美的民主，而建立更善更具備內容的民主。因為民權若沒有「和社會主義相連帶的，或同時達到的」解決，社會問題反產生了更複雜難題，中國建國要在削弱資產階級法權的神聖性，而具備着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前途條件。所以他說：「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就會學到法美，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又說：「我們提倡改革，決不能夠學到了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若是再起革命，豈不是現在的革命徒勞無功麼？」（第六講，一五九頁）

二，民主是國家形體之一，民主政治的機器應當力求進步，使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使民主成爲可逾越的東西。所以中山先生批評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機器不完全，我們應當採取新式的完美的民主政治的機器。他認爲歐美民主政治的機器之主要缺點，在於人民不滿意於政府。這一點，我們可以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本質上是少數人的民主，大多數人是被限於狹隘的民主權利範圍以內，自然不會滿意的。中山先生說：「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樣攻擊政府總是不理。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人民對於政治機器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第六講，一五八頁）因此，中山先生主張中國要「造成一個民治的國家」，「民權思想儘管是從歐美輸入的」，而民權制度都要求比歐美進一步，適合大多數人的要求。他主張用這種新式的民主制度，使政府與人民統一，政府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上面，而比歐美「不澈底」（一六〇頁）的民權更進一步，超出「人民和政府日日衝突」的民主，「超出民權新力量與政治舊機器」的民主。「建立民權新力量與政府新機器」的民主。「澈底」的民主制之新力量是大衆，新機器是有內容充分的形式，中國建國便是這樣民主的新方式。所謂現在法西斯主義的「專橫」，（見上字句），中山先生見之，恐作三日嘔！

三，中山先生權能分別的民權學說，曾引阿斗與諸葛亮的比喻來說明。如果我們不惡意地曲解，這是應當從黨政治方面去了解。我們知道，前進的政黨都是政治覺醒的分子，是全民的甚至階級的少數，而大多數政治不覺醒的羣衆是應該由政黨少數依據正確的綱領而領導的。

這一正確的領導，使羣衆——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成爲直立的金字塔。在這裏，我們認

爲中山先生所謂阿斗的比喻，是指有政治權利而無政治覺醒的大衆，而所謂諸葛亮的比喻是指政治覺醒的政黨。革命的政黨以及指導的領袖，基於大衆的要求而實行「治權」，而給與以廣大民主權利的大衆行使積極的「政權」。中山先生根據這一理論的說明，使人民大衆的利益主張不和政府相衝突，避免資產階級民主的狹溢流弊，可能向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前途發展。這是原則，建國的具體方案應如何充實這一原則，正是我們所應努力的。

中山先生的主張，一方面要「造成萬能的政府爲人民謀幸福」，他方面使「中國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中山先生指的新世界是什麼呢？是較高度的民主政體，他在別處說過：「俄國人民……的幸福是由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的。……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

（本文載時事類編二十五期）

抗戰建國與中國憲政之路

一 抗戰民主的建立

我們在目前抗戰階段，正確的具體認識，應當是對內的民主服從民族問題的對外民主。從前文化界有「抗日第一」呢，或是「民主第一」呢，兩面的爭論，這種無代價的爭論，原因是不了解民主問

題中具體的歷史概念，歷史內容會把問題設置於第一或第二的位置中。

臨大會宣言謂，抗戰依賴民力，而民力與民權（民主）則相為因果，這已經指示出抗戰民主的端倪。這主要內容是喚起民衆與改革政治機構之兩點抗戰建國綱領上的規定。

第一點，我們可以說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第二點可以說是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進。二者的相互配合的發展，可以達到抗戰民主的完備程度。

中國在某方面亦好像前世紀的德國，一方面苦於封建制度的頑固，他方面復苦於民族資本發展的不足，所以亦同樣『爲死的所苦，復爲活的所苦』。因此在德國，『不要使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〇年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往後倒退，應該用「由下而上的運動」來補充牠』。

在目前抗戰期間，我們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問題，更嚴重於當時的德國。一方面『貪官污吏，甚於漢奸』，他方面在敵人所佔領的後方，最落後的封建殘餘被敵人收買而企圖建立漢奸政權，以遂敵人以華制華的野心。而這兩方面的政權形式，都是民主形式的對立物，因爲民主運動，在我們的後方，應以『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爲主，而副以『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平等的號召之下，相當地給與公民以平等權利而參加政治，增厚抗戰力量，只有這樣的民主形式，才能容納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精神』；在敵人的後方，則主要『由下而上』澈底建立民主政權，在政府領導之下，使已成立的漢奸政權，由民衆的力量施行摧壞，使準備成立中的漢奸政權，由民主的政權的建立所克服。

『戰爭是革命的熔爐』，我們在抗日過程中敵人的大炮落到『中國的活的頑石』上，沒有把頑石

粉碎，相反地倒使『頑石』點頭，這一頑石點頭的意義，便是從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給與了我們以鍛鍊的好條件。封建剩餘在這長期抗戰的大熔爐中，好像腐敗細胞之在一個熱症的病體中，會由環境的壓力，而趨於死亡，祇有新生的細胞組織才會健全地克服熱症壓力。這種生理的克服，在抗戰的過程中便類民主勢力的戰爭發揮精神一般。反之，我們一任舊的封建細胞作祟，那麼不但不能挽救危亡，而且會把整個民族葬送墳墓。同時，我們亦要操心熱病的續發症，不使腐敗病菌，發展於身體部分，這種以腐菌害新的生機之發展亦可以致命，亦猶之乎在失地的一隅，以華制華的漢奸政權的建立之發展，可以致中國民族於危境。

抗戰建國綱領，在抗日過程中，是一種新的號召，由這新生的號召產生一種新生的力量，這種抗戰力量的形成，便是『抗戰民主』的主要精神。在第一期抗戰中，我們曾經獲得了相當的勝利，軍事上的勝利是和政治進步相配合着。我們爲什麼當聞到津浦路的捷報時，同時獲得到抗戰建國綱領的公佈呢？這不是偶然的，亦猶之乎當聞到蘆溝橋的砲聲時，同時就獲得到廬山談話的『應戰』指示。後者抗戰開始的政治形勢，與前者抗戰轉機的政治形勢，都不是偶然的。從後者新生開始的號召，發展而爲前者新生充實的號召，那是由於新生的民主力量發揮的開始，發展而爲新生的民主力量發揮的充實。我們在抗戰民主堅決的進一步發展中，還有更新的號召，更新的力量，甚至更新的抗戰勝利的局面。現在由國民政府所公佈召開國民會議的進步就是這意義。

抗戰民主建立運動，不但是一個形式的號召，應是一個『逐漸擴大的民主制』，使民主制部分地真實地實現於抗日過程的爐火中。

抗戰民主的新的力量，大於過去中國社會的一切力量，這不是抗戰前可以準備為先驗的東西，而是在抗戰發展中逐漸進步而為嶄新的力量。因為不健全的政治機構以及以華制華的漢奸存在，有社會的基礎，我們的抗戰民主是和這二種惡社會環境奮鬥的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

一、抗戰民主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要問什麼叫做『抗戰民主』呢？

自然，歷史上沒有這個名詞，亦沒有過這樣的民主階段，這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過程中特有的一種國家形式，反法西斯世界戰爭的半殖民地革命任務所自己規定的一種民主制。這裏面的意義有兩方面：

一、『民主的意義就是平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暴力的革命過程中，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國家所領導的人民權利的奮鬥，形成了『兩極相逢』的雙翼，這一偉大的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主要的號召是保障『民主』，要求『民主』。所以在先進國家今日推翻法西斯資產階段的鬥爭中，民主運動成了一種基本的任務，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如果不是一個簡單的兩國軍事戰爭，而是反法西斯保障世界和平運動的一環，那麼中國在全世界大民主號召的空氣中，中國不能不有配合世界潮流前進的運動，而且必然要在抗戰過程中培養扶植起中國社會所特有的低級民主，這一性質是具有世界意義的。

二、在中國抗戰過程中，一方面適應戰爭的發展，中國須依賴所謂『民力』的動員，這與民主相

爲因果的民力動員應依於政治的民主改進的。

抗戰民主可以是更低級的性質，就因爲對內民主服從對外民主（對外政治上的民主，即民族解放）這裏所謂民主自然是中華民族整個的獨立意思。

抗戰民主的最低限度的任務在於建立反貪污反漢奸的，遂行極積動員民衆的政治機構；同時在於融洽我國諸部分少數民族並使自主的參加政治的廣泛政治機構。抗戰民主，最要的，是在抗戰過程中，要積極淘汰腐朽動搖不定的份子，而廣泛容納進步的抗戰最力的新的社會力量，使抗戰的民主號召的形式，與抗戰犧牲的民主權利的內容相配合起來。抗戰的民主平等的形式，同時亦是抗戰的民主自由的形式。平等的形式，是喚起民衆的不二法門，同時自由的形式是民衆自我教育的無上命令，臨大會宣言謂「三民主義是具有『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民意之需要』的精神，我們以爲抗戰民主的建立，正是三民主義之在新潮流與新民意之下的偉大精神。」

三 到建國民主之路

我們不能在書齋裏暗想，我們要根據現實的發展而細密地思維。建國的民主，不是天然的圖畫，由一個藝術家去運用想像力構繪，牠是抗戰民主的發展，因而是由抗戰民主發生出來的更高級的民主形式。

抗戰的民主是黨派最先進份子的團結之基本條件，沒有這一民主條件的發展，最後勝利是難於期望的。反之抗戰民主發展愈高度化，愈有望於取得最後勝利。同時愈具備好後一階段建國民主的物

質條件，愈順利的轉變到建國之路。所以，建國的民主，與其說是在將來建國階段中建立着，毋甯說是在目前抗戰階段中發展着。

然而，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抗戰過程中的民主發展，同時便是對社會力量的形成的發展，這種新社會力量，常大於社會全體，猶之乎，在抗日軍事發展上，第二期抗戰由戰略戰術，物質與精神，以及民衆配合諸方面所發展出之新力量，二年多來由教訓中發展出的力量，大於準備了數年的全部。新的社會的力量，參加抗戰的各階級各政黨的民主權利，無疑地要在建國過程中尋求最好的適應的民主新形式。

民族革命戰爭，使全國民衆，由抗戰民主的扶植，這時已經準備好解決民主共和國物質條件；所以臨大會宣言中說：「民衆方面則注意於能力之養成，政府方面則注意機能之適應，此固所以充實抗戰之力量，而民權（民主）之基礎，亦於此建立，則抗戰勝利之日，結束軍事，推行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而勢固致順也。」

四 建國的民主是什麼呢？

有些人常說，中國建國是「非資本主義的」，這等於說是非牛的，非馬的，而沒有規定了問題。有些人亦說，中國建國是社會主義的，這是犯了急性病的一種希望，並沒有了解中國社會在脫離帝國主義羈絆時，即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時，自己歷史發展的本質。

誠然，在中國建國開始之日，從帝國主義世界的沒落程度上講。建國民主沒有典型的資產階級的

民主歷史，從中國社會的經濟構成上講，亦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歷史，典型地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等段的民主，與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的民主，在中國歷史上全不會有的。

因爲，前一個過渡階段，是純資產階級的法權（平等），在形式上空虛地把民主建立起來，私產權利與勞動權利同時支配着社會，在後一階段，部分地還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承認個人私產的法權被取消，「而還沒有消滅給不同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之不等量）勞動以等量生產品之這一資產階級的法權。」

我們的建國的民主，既不是前者，更不是後者。第一，我們還不能夠消滅生產資料個人私有的法權；第二，我們復依照世界歷史的發展與教訓，不可能只在形式上發揮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形式的平等，使陷於中山先生所謂「少數人的民主。」

我們又知道，蘇聯的民主，雖然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一部份，但這已經「成爲各份子間生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法權的內容已經改變了，因此，中國的建國，在承認資產階級的法權全部皆存在的原則上，可能使法權本身的内容改變了。私產的法權，可能發展而爲不是神聖的法權。私產在生產過程中可能發展而爲計劃的部分。

我們爲什麼說這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民主呢？因爲我們沒有社會條件消滅資產階級的法權。然而，我們爲什麼說這又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呢？因爲我們在世界史中進了一步，並非純粹接受着資產階級形式的民主，而可能在接近於民主實質上去進一步否定資產階級的形式騙局。這是我們建國的特有的民主制，我們的歷史把我們規定了的。

這樣的憲政的民主，決非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以抗戰發喪中各階級力量，在新的形勢之下，共同建立共和國的半殖民地解放後的特殊民主。如果具備着新的條件，這才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建國的民主之主要任務：是消滅封建殘餘，計劃國家生產，光大民生主義調整階級利益，保障直接生產者的最高民主權利，勵行澈底的社會政策，實行大多數民衆的勞動政策，消滅官僚制度實行澈底的地方自治，承認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消滅文盲提高文化水準，等等。

這又不是所謂「適乎世界潮流，合乎民意需要」麼？我們不應當形式地了解潮流與民意，主要地要從世界史的發展與中國新社會力量的發展，而把握現實的潮流與民意。

因此，我們不能不研究抗戰勝利前途的條件，和其對於建國民主的關係。

五 抗戰勝利的條件配合與建國民主的程度性

中國抗日民族解放勝利的前途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已經被一位導師指給我們：

「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不但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要保證這種戰爭之勝利，當然要有：或者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之居民共同努力（例如我們引作例證的印度和中國內數萬居民之努力），或者國際形勢中種種條件之特別的配合（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其本身勢力之削弱，因其彼此進行戰爭，因其彼此對抗戰等等而無法實行干涉），或者某一個強大國家裏無產階級同時舉行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最後之舉出的一個情況，乃最合希望和最有利的情况）。」

第一，我們本身的條件，即是抗日民族統一團結的發展「巨大數量之居民共同努力」。中山先生曾指示我們要學習俄國革命的方法，伊里奇先生亦說蘇俄「戰鬥勝利的歷史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是有極大全世界的意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果真能喚起千百萬民衆，便能產生可能的奇蹟，根據蘇聯共和國所有的經驗看來，東方民族的解放現在是完全能實現的。」

第二，大列強的世界戰爭，在目前對於我們最順利的配合，便是因了民主對法西斯，而對於弱小民族的束縛放鬆，如果這一形勢的發展到更好的程度（反法西斯），那麼國際形勢的特別配合便成爲我們勝利的條件。

第三，便是法西斯國家的內亂，無產階級的反法西斯統治的革命，這對於我們是有最大的幫助力量的。

第四，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保障世界和平的武力堡壘以及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條件，將給與中國民族解放成功的一大支柱，同時這一社會主義向世界的模範的發展，還是前三個條件的有力支持條件。我們民族解放的成功前途，主要還是根據於第一條件的自己「共同努力」的統一團結之鞏固與擴大，因爲我們自己本身所產生的新力量，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力量，同時可以保障勝利的發展以至於建國之路的真力量。目前國民會議的憲政運動就應是民主的擴大。

我們抗戰勝利的前途，如果在以上四種條件皆具備的場合，那麼建國民民主的內容是最高度的，因爲不但我們自己具備着保障勝利的新力量要素，而且全世界的環境已經將脫離資本主義支配世界的國際關係，我們在那時候的建國，不但能克服本身的阻力，而且沒有國際帝國主義的某種阻力與干涉，

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發生社會革命的條件之下，東亞版圖顏色已經改觀，我們建國的民主，很順利地即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復次，我們抗日勝利的前途，如果只具備內部的條件，則建國民主的內容是可能為相當高度的，然而却因外部的阻力以及帝國主義的經濟關係之束縛，或新的離開中國社會關係的政策，而受相當的痛苦。因了對付外部的國際環境，便要減少內部民主發展的價值。反之，如果祇具備外部的條件，則我們的成功是一種僥倖，建國的前途雖然因民族解放的勝利，可能向前邁進，而民主的內容却是較為低度的。但所謂低度的民主，亦有等級性的，因為外部的條件，有後三種條件一齊具備，或一種具備，或兩種具備之不同，故對於中國建國的民主是有彈性的影響。

最後，我們抗日勝利的前途，如果具備着內部的條件，同時亦具備着外部的條件之一種或兩種，則建國民主的內容，比只具備內部條件之場合者更為高度些。但，所謂更高度些的民主，亦有等級性的，因為外部條件的三種性質不同，故對於中國影響亦不同，假如具備着外部條件的第三種，則中國建國問題的民主性質便稍高，假若法西斯國家一齊因國內革命而崩潰，則中國建國的民主更稍高。反之，假若是具備着外部條件的第二種，則中國建國的民主便稍低。我們還可以說，第二種外部條件或第三種外部條件和第四種外部條件的配合亦是不同的，這一配合的不同，影響於中國的建國民主亦有差異。

現在，我們政府已經公佈推行憲政，並限於本年十一月召開國民會議，這正是在第一種基礎條件上的努力，如果依照中山先生北上宣言的精神而充實國民會議的遺教，則我們獨立解放的前途，如光明之燈塔，樹在目前！（註：此文寫於廿九年）

根據第一種條件之自身努力，將抗戰民主的政派團結，發展而為廣大民衆的公意團結，不但是抗戰建國的基本任務，而且是推動後三種條件發生之有力槓桿。因為各種條件的一齊具備，事實上是難有的，而有力的一種條件的具備，則恆常把其他條件推動成活生生的實現。

六 中國憲政之路

我們知道，近代各國憲政歷史有澈底民權的憲政運動，有自由派資產者的改良路線，這兩種途徑都在中國近代史上排演過，第一種便是由民主革命綱領為基礎的憲政，從以同盟會政綱為內容的約法，經過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宣言為內容的國民大會之號召（參考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一直至目前以抗戰建國綱領為內容之憲政推行；第二種便是由李鴻章新政以後的保皇立憲，經過民元一部分革命黨人放棄黨綱的立憲主義，一直到中山先生所誹議「豬子議員」的賄選憲法等。

誠如中山先生在黨綱中所言：「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綱，為第一步之救濟方法。」（全集，第二卷，一二三頁）

因為「綱領是說還沒有東西，憲法是說已經具有的東西」，在具有的東西未備之前，如議會主義者放棄政綱而高調議會形式那就流為所謂「假像的議會主義」（*Sein Konstitutionsalismus*）即改良派的路線，所以革命綱領才是憲法中的靈魂，若忽略了這義，便不是「澈底民權」（中山先生）之路。

第一，近代中國歷史 誰都知道包括着三個時代問題，以民主革命為中心，向後反抗對外的侵略與掃除中古的舊制，向前迎接社會主義前途。最豐富內容的歷史，提供了偉大民族的中國。

第一，中國進步運動的限制性，更有以下的特點，一方面中國民主運動落在日本維新之後，不可能有德國革命以後世界自由資產階級的保存古制或妥協維新之前途，祇有在廿世紀直向繼承法國革命的澈底解決，他方面中國半殖民地的落後社會，和其他落後社會一樣，到社會主義的階段越多，因而祇有民主革命的高漲，經過革命的「實行」，而達於「理想」。所以中國抗戰建國的領導，既包括着三世紀的教訓，而後限制於一個中心——「澈底民權」。（見民權主義）

第三，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因了法西斯的侵略，不論在中國獨立自主本身或在世界光明前進中，更提高了中山先生抵抗外侮的「積極方法」，那就是「振起民族精神，以求民權民生解決」。（見民族主義）。

因此，中國憲政之路，不但是克敬中山先生所謂的「盲目的維新」，而且須以革命政綱為基礎，實行「徹底民權」的憲政主張，清算中國過去數十年來改良派議會主義的妥協錯路，向較接近於民主實質之路發展。

七 結語

「現在中國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民權主義第五講）

「我們能够照着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中國要進步，民族前

途沒有危險，自己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想辦法。我們對於民權政治，……雖然不能完全倣效歐美，但是要借鑑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族經驗研究清楚，」（同上）以實行「駕乎歐美而上的民權制度，」（同上）

我們希望國民大會是一種中國議會歷史的清算，更是世界民主史之批判發展！（本文發表於中蘇文化五卷一期）

論解放戰與民族主義

在目前敵人以最大軍事陰謀，企圖攻佔武漢我們這一軍事政治文化中心的時候。我們的抗戰偉業的確達到一個劃期的階段，因而在理論與實際上要求我們對於抗戰的深切認識，據以把握勝利前途的實質，亦委實是一個中心的課題。所以，民族自衛戰與民族解放戰的統一的把握，在這裏需要一個明確的說明。

（一）感性認識的粗糙普遍性與理性認識的歷史任務

因了日寇七，七的炮火，更嚴格地說，因了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政策具體表現的九一八炮火，使中國近百年來的被壓迫民族起而自衛，在無所顧忌也為世界和平，為正義人道而應戰，而抗戰。在侵略的意義上而言，由全民普遍地都直觀到生存與死亡的分界最後關頭，自發性地歌唱着反抗壯曲，悲憤地執戈禦侮而言，抗日戰爭是一種「正當防衛」，是民族自衛戰的範疇。這一範疇，一方面激發

起所謂「千萬人的呼聲」的內容，是最普遍鬥爭性的，他方面則抗爭的手段與目的，表現着直接採取的粗糙樞統性，是不計利害的最慷慨悲壯性的，所以，我們以為民族自衛戰的鬥爭意義，是最具體的富於內容的「感性認識」，這亦猶之資產階級內戰的日常經濟鬥爭最具感性一級，為生存條件而奮鬥的被壓迫者模糊理解於政治的遠景而由迫切的工廠鞭鞭自發的反抗運動。

然而，由這一感性認識而發生的成仁取義的犧牲是進步的，既不是中國歷史上「氏族國家」沒落時鄭子產「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反抗時代發展，又不願為封建漢祚傳統的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不可為而為，因為抗日民族解放戰從感性材料一開始就提出了革命的理性認識的領導發展性。例如我們從綏遠抗戰時代閻百川先生的「守土抗戰」與「犧牲救國同盟」組織併行提舉而言，便知道自衛戰與直觀性之連帶關係，然而這不是說近一年閻先生的「民族革命」口號與其十大綱領是一種與「守土抗戰」的對立，乃是感性認識一開始便含着到理性認識的發展性。因為中國近百年來被壓迫半殖民地的歷史，到現在是一個持久戰的清算的階段，不是一個孤注的一擲。數十年來中國反帝國運動的傳統，發展到目前的抗戰，在敵人由「蠶食」變而為「鯨吞」，在我則號召起從未曾有的普遍感性抵禦力，更發展出積極的政治領導綱領（更本質的東西），抗戰建國綱領。

我們要了解：所謂感性認識的自衛戰不是純粹的東西，並不是和理性認識的解放戰絕對分離的東西，而且感性認識的東西，並不是非真實的，牠有具體的認識價值的。可是由正義人道的直觀的東西，單純發展而為成仁取義式的弱國犧牲論之幼稚概念，那便是嚴重的錯誤。相反地，否定自衛戰的具體性，抹殺普遍感性抵禦力的客觀價值，而懸空製造一種「經濟分析」，洗刷了民族鬥爭的內容，

純化了「進化史」的形式，那是危險的抽象。

民族解放戰的主要意義，是在於積極的政治領導。「爲一個觀念所貫通」，爲一個正確的革命綱領而奮鬥。其實，在我們抗戰一開始就具備着領導的基礎——統一團結，在抗戰過程中已經發布了全國擁護的奮鬥綱領，今後如何爲貫徹這一綱領而奮鬥。我們實實着進化意義的自衛運動，同時更重視着革命意義的解放運動。這便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之路。

耶塞夫說：「進步的成份自發地繼續着它的日常工作，而使舊有秩序發生小的數量變化時，運動是進化的；當同一成份聯合起來，爲一個觀念所貫通，並以加速的步驟向敵對陣營邁進，爲的根本消滅舊有秩序及其質量特徵而確立新制序時，運動是革命的。」

民族自衛戰已經把敵我的主奴關係發生了小的數量變化，我們須更要遵從中山先生所謂士敏土的團結，所謂依「革命的方法，實行革命的主義」（民權主義），澈底實現民族革命戰的一個觀念——綱領，根本改變半殖民地的舊制序及其質量特徵，而確立中山先生所謂「破天荒的地球上的新世界」。（同上）

所謂理性認識，却也不是一舉手的完璧的產物，而是在實踐過程中的發展物，尤其在正確認識領導的實現工作上，包含着更具體的艱苦奮鬥。民族解放戰，爲了使廣大的民力形成集合在綱領周圍的政治力，主要還是民主機構的發展。

（二）被動的消極的與主動的積極的抗戰

我們所謂民族自衛戰是被動的消極的範疇，不同於我方軍事戰略上的被動性的內綫作戰，因爲認

識過程沒有純被動的，一開始就在勞動的積極方面推進着，同樣的自衛感性認識亦是一開始在鬥爭方面推進着，不過在感受機能上祇是反映一個側面，沒有全般統一的聯結，不能更積極地改變世界。解放戰的理性認識領導，不是與自衛戰的感性認識分離，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所謂主動積極性的說明，是指着把全世界的關係，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中國半殖民地地的革命任務，作為全般的聯結看待，要求發展而為認識運動最高級的形態。

如果沒有日寇炮火的進攻，我們一開始就依據數十年的革命傳統，積極在革命綱領領導之下，舉起民族解放的革命戰，那便證明中國革命史已經發展到高度形態。但是，抗日戰爭是由敵人積極進攻的應戰開始（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那麼限於由自衛戰的意義開幕而言，敵人是主動的，我們是被動的，敵人是法西斯侵略者，我們是被壓迫民族的反侵略者。敵人把「蠶食」政策下我國全民尚不能普遍直觀到的東西，現在由飛機大炮暴露於最表面，使各階層都推出拒盜的危急情緒，我們由目前全國一致盛行歌詠的救亡歌曲普遍而言，就了解到反抗感受性的意義。我們未曾做到的「喚起民衆」工作，在這一點上由敵人的侵略轟醒了。所轟醒的，自然多分含着被動的成素。

然而，敵人是被革命者，我們却是革命者，敵人在帝國主義沒落階段迫向軍事危險，倒閉歷史車輪，我們却是為了改變歷史，發展中國，推進日本，光明世界，而開着「革命的火車頭」。敵人祇有在摧殘其本國文化，彈壓其進步份子，架於嚴重矛盾之上擴大種族鬥爭，我們却根據革命的團結力，依照正確的政治領導，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歷史矛盾，並解決日本帝國主義自己的矛盾，敵人的瘋狂和我們的理性，復表示出敵人的被動消極與我們的主動積極。

革命者與被革命者的對比，在鬥爭過程中，即使直到被革命者危機將暴曝的前夜，表面上還是壓迫者的炫耀一世，而實質上的垂死性恒常被其赫赫之功掩蓋着。所以，民族解放戰爭，是要經過長期的艱苦運動，才能到質的飛躍，積極性的條件是在奮鬥中充實起來。

(三) 以空間換取時間，復以時間創造新空間

無疑地，在第一期抗戰中，如六十師武力的東戰場戰爭，南口的效命抵抗，除了應在戰術上批判而外，政治意義上實在是一種「守土抗戰」式的英勇自衛。退出南京以後，與抗戰建國綱領公佈同時，始改正了某項戰役中單純自衛戰的半決戰觀點，例如有名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一原則便是這樣的提示出來。我們在過去各戰役中的英勇犧牲精神，在感性的評價上，實在是一種無上光榮，正義的最高命令，我們却也不能忽視欠缺民族革命戰爭要件的配合。

沒有到大決戰的階段，自然是一面以自衛戰的精神，配合着戰略被動與戰術主動的統一軍事領導，拒敵人於戰術或戰役的外線作戰領域，盡可能保衛敵人企圖佔領的土地（如保衛大武漢）、一面更緊迫地加強民族革命戰的條件，根據與「民力相為因果的民權」（宣言）進步，而培植民衆的力量。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內容，便是民主力量的充實運動。根據這一充實運動的成熟條件，使敵人要佔領的土地一開始便成爲其心腹之患的生銹，已佔領的土地則變更後方爲前方，這樣地以空間（尙未具備動員條件）換取時間（正在培植民族革命的條件），但復以時間（養成民主革命力量的內容）而創造新空間（具備着政治動員條件），一直達到反攻階段時空的統一，收復失地，完成中國的獨立自主。時空範疇是物質運動的形態，敵主動優勢時，敵佔據的空間與我充實的時間相對立，到我主動優勢時，

前者與後者表現爲最形式的混亂對峙，直至我反攻時，前者與後者都屬於我們的。

自衛戰的最高目標，是不使我方的尺寸土淪於敵人，解放戰的最大任務，是使敵前後方以及戰場的尺寸土皆變做不利於敵人之荆棘而利於我方發展的政治環境條件。但這一分野，並不是分離獨立的，而是二者相互統一的，相互配合的。在最後發展條件之下，每一戰役中的自衛戰同時便是民族解放戰的具體表示。

（四）由外部束縛的變動反映於內部的自衛戰與解放戰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在某一階段矛盾的姿態爲協調，過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市場矛盾便常採取着勢力範圍的均勢運動，這反映於中國，一方面增進了中國的社會危機，他方面產生了中國的內亂；然而到了該不平衡的發展至尖銳化的時候，矛盾暴露在素朴的形態，由帝國主義的不協調至其「突變性規律」的支配，產生了九一八以來日寇的武力獨占，這反映於中國便是國內的團結統一。前者協調——內亂是他們的侵華有利武器，這武器發展至現在變爲中國把握的東西，全民反內亂的團結。

由日寇不平衡性的獨占東亞市場，一方面，使中國的民族自衛戰迅速便直觀地暴發起來，他方面使中國解脫於國際帝國主義數十年來協調枷鎖制約中國的內亂，一開始便以民主基礎的形態——統一戰線，進行着民族革命戰的任務。並以鞏固團結爲基礎，而爲實現革命綱領而奮鬥。

（五）由對內民主的建立達到對外民主的爭取

民族解放戰爭，本質上是壓迫民族要求脫離歷史束縛的全民族的民主要求。換言之，它是「政治

上的一種民主要求」，向侵略者爭取民族平權的要求。所以，「民族問題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

敵人的侵略戰爭，是政治民主的反對物，所以敵人爲了達成這一侵略的野心，是用內部法西斯反民主的軍事專制體系，而反民主地向外部爭奪殖民地。敵人是內外法西斯的反民主的反動。

我們的民族自衛戰與解放戰的結合，自然形成了與敵人相反的途徑，是用內部民主的集合力，更完善更進步的民主機構，而爭取外部民主的成立——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如果沒有內部民主的堅強機構，而爭取民族的民主，那是單純的自衛戰，阿比西尼亞便是前例，亦尤之乎敵人如果沒有內部的法西斯專暴，便不能產生法西斯侵略。如果是這樣，中日問題不過是數千年前强大部落對於弱小部落的俘獲戰爭罷了，那全沒有歷史的意義了。

我們的抗戰，若僅限於後進國對先進帝國主義的反抗，再沒有民主的意義，那不是革命的戰爭，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反抗。反之，正因爲內部民主側面與外部民主側面的統一認識，以內部民主爭取外部民主，復因外部民主的取得而更提高內部民主，由建國而抗戰，由抗戰而建國，具有了解放戰的基本條件。抗戰在建國過程中，建國復在抗戰過程中，建國空想論者實在忽視了民族解放戰的從進化到革命的實際奮鬥過程。

所謂抗日高於一切，是指對內民主的奮鬥不妨害於對外民主的爭取，具體講來，對內民主一定是個低級的形式，各黨派和平批判的形式，以這一民主側面的意義而服從於對外爭取民主的側面。倒沒有什麼「抗日第一，民主第一」的爭論價值。因爲極高度民主形式的主觀提出，實在有礙於抗日運動的。

和平奮鬥的內部民主現在已經開始了它的端倪，更需要由這一端倪向前邁進，在實踐過程中由形式上的東西，更具備起民主的內容。這一發展條件是民族解放戰的本質，我們能不能達到戰略的反攻階段，就看這條件的成熟與否而定。

在保衛大武漢的嚴重階段，正是全國上下以最大決心向前邁進的時候，武漢的爭奪戰不但是具有劃期性的，而且具有危機意義的，我們如果在自衛戰到解放戰發展之路上取得鬥爭的基本條件，發揮內部民主的精神，我們便可以在保衛大武漢過程中開始了變更對敵舊秩序的奮鬥基礎，甚至在武漢危機的不利條件之下也可以產生出更有利的條件，但這不是說不利的條件一定可以機械地變出有利條件，因為不利條件的積疊可以由量的增加變更了質的前途。事物可能性的東西，恒常是有幾個方面的，可能性轉化而為現實性的根據，惟在於現實認識與實踐發展的統一。

（六）民族解放戰的中國與世界的結合。

中國的民族解放戰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運動，而是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特殊的合法則性」的東西，如果這一特殊的合法則性是和「一般的合法則性」相背馳，那麼民族解放戰便沒有內容，那便形成狹義的國家主義。在這裏所謂內容的東西是「民主」，因為世界一般的反法西斯反侵略運動，是以爭取世界民主為內容，而爭取世界民主的具體運動，在國際反動「環境控制」條件之下，是民主的和平的運動，在各國內的，是人民民主的聯合，在弱小民族的獨立自主奮鬥中，是民族團結的內外要求政治的民主。所以，民族解放戰在全世界民主號召運動之下是中國的運動同時亦是世界的運動。

法西斯國內的爭取「狹隘的民主」，是保障人民法權的自衛，這種自衛性質最低度感受性已經涉

及感性的東西，這一普遍感性認識無疑地是反應法西斯壓榨的抵抗。這些國內的革命綱領的發展，要看廣大人民勞力是否具備進攻的條件，因而始能由法權自衛發展而為革命行動。同樣的，民族自衛感是法西斯對外壓榨的抗禦，而解放戰的綱領能不能實現，要看對內民主勢力的鞏固與擴大。

爭取民主有人以為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相反地若不為民主制而堅決地奮鬥，絕不能完成對於民主的革命。中山先生更明白地說，現在是「民權世界」，我們應不滿於歐美民權的歧途，為健全的民權而奮鬥，這樣的奮鬥，據中山先生說，是「民權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問題，這亦是與伊里奇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澈底時便接近社會主義的門戶」之旨相同。「民主不是不可逾越的東西」。

在這一點「民族問題不但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現在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的民族自決綱領，「在大民族是分裂主義，在小民族是聯合主義。」現在，凡法西斯都提出種族的哲學，把對人的關係，解釋做合理的狼對人的關係。這些大民族的法西斯主義，什麼大日耳曼主義，大和魂主義，羅馬帝國主義，都是民族自決的面具，直到現在最嚴重世界戰爭危機的捷克，仍然是由希特拉的日耳曼民族自決開步走向放火之路的，亦猶之乎日寇陰謀的大蒙自治，大回自治，以自決掩蓋侵略。

民族自決，不是抽象的一個類概念，而是具體的東西，在法西斯民族主義是黑暗反動，在中國弱小民族獨立却是進步革命，在法西斯的民族問題的分裂（如朝鮮獨立，奧大利獨立）是進步革命，在中國弱小民族的民族聯合（或捷克的各民族聯合）却是進步革命，這裏的分裂是破產。

形而上學裏沒有這樣具體矛盾統一的概念，祇有新科學方法才解答了民族問題的歷史意義。同樣

的，在形而上學裏，民族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與民族主義拒中的東西，然而我們卻知道，真正的民族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社會主義並沒有害了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不正確的空想烏託邦主義才是中國的危險物。

『「兩極相逢」是不是萬應的原則，要明白這一點，可以看中國革命對於文明世界所大概發生了的影響。歐洲各民族最近將來的起義，和其爭取共和自由及比較廉潔政體的這種鬥爭的最近階段，有賴於「天朝」（歐洲的正反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比有賴於其他任何政治原因之大概要甚多』。

中國民族解放戰的價值，顯然地比重甚高，如果我們堅決執行到中山先生「創造嶄新世界」的遺教，又不但是「有賴於天朝」的問題，而且是另一個判斷，「落後的歐洲，進步的亞洲」。（本文載時事類編廿三期）

廿七年九一八紀念日

論中山先生「打不平」文化的光大

——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

第一節 中國現階段文化運動的號召

現階段文化運動，在抗戰開始以前，在文藝運動的領域內，曾進行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底大眾文學」兩個口號底論爭，以求確立適應於統一團結之文藝的統一戰綫的總口號，這一文藝

運動的總的口號之論爭，在三年前的中國文壇上，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全面統一反抗日寇法西斯侵略之意識形態的自覺、或自我批判。（註一）

和這一文藝自覺手段的運動同時，中國在全文化的領域內，又提出了「新啓蒙運動」底文化統一戰綫的總方向，代表着適應統一抗戰成立過程之文化覺醒奮鬥，這一運動，在抗戰二年來的過程中，缺乏積極的批判發展，僅作爲現階段文化運動的總方向，而與「戰時文化」這一口號取得了一種聯結。（註二）

在抗戰的一年關頭時際，中國文化運動的發展，曾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如對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積極提倡），指示出根據中山先生遺教的正確領導。這一領導，自然是不出於以下的革命教言：「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爲新國家，當鑿鋤舊思想，發達新思想」，「必人人將舊思想全行消除，換入一副嶄新思想，方能成功」，「俄國有了這種方法，所以革命……成功，革命……的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知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知識，有了知識便有了方法，有了方法來革命，就馬到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沒有好學問好方法……實在是不知而行」（註三）所以臨大會宣言說，三民主義是具有『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民意之需要』的精神，（註四）中國文化運動，當亦是在世界潮流與民意需要二大課題之下，而作奮鬥的先鋒。

由世界的潮流方面出發，中國文化運動顯然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反「焚書坑儒的復古神話式的國權主義」（對內絞殺民主），反「危機死亡綫上的戰爭主義」（對外侵略冒險）。這一文化運動，正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國際性，因爲我們的民族危機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窒息系統一般危機底一環，

因而「保衛中國文化本是保衛世界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大課題」（註五）。所以，在抗戰現階段，以中國文化國際性的強調內容爲主題而提出反法西斯的戰鬥文化之號召，確是有理由的，「文化國際」創刊中高麟度先生的卷頭語與芮沐先生的「文化的奮鬥」，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由民意的需要方面出發，中國文化運動亦確如張申府先生所提出的七個啓蒙運動的必要內容（註六），而其主要方面，一即顧頡剛先生所謂「黑暗部分」的剷除，他在文藝通俗化方面所提出的七個批判的見解是有價值的意見（註七）；一即戰時文化動員的開展與深入，如潘梓年先生在讀書月報第一期所論者。

從狹義的觀點出發，在保衛民族獨立的戰爭中，亦有人提出民族文化（註八）的口號，更以思維純粹形態的抽象，亦有人引伸到「理性」運動的（註九），再，科學化運動亦是一個合乎民意需要的特獨部面，然而這都是強調一面的見解。

在文學部門中，儘管有戰前的「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底大眾文學」之論爭，而在文化全領域中，我們却不能引伸到「國防文化」或「民族革命戰爭底大眾文化」，因而「抗戰文化」，「戰時文化」，俱不能要求出對於現階段文化運動創造性的答案。復次，我們不能機械地把世界潮流與民意需要作孤立觀，故由世界潮流出發的反法西斯文化與由民意需要出發的啓蒙運動，似乎不能表現出中國社會發展與中國民族解放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在法西斯絞殺文化與侵略戰爭中，應具備的中國文化運動的總路綫。

最廣泛性的中國文化運動底規定，是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即民族獨立，民主權利，民生幸福的中

國文化運動（註十），或梁寒操先生所謂革命科學人道三種思想的文化運動，這是過去數十年一直到現在的中國文化運動都可含容着的，而這「文化運動」的目前階段的具體規定，即在目前「適乎世界潮流，合乎民意需要」的文化動向，應是既在三民主義的精神上有其高度發揮的內容，復在時代意義上有其正確的表现形式，在中國全歷史民族文化的發展上有其最好傳統的承繼，尤其是五四運動之革命傳統的承繼（民主主義）並批判（自由主義），在世界現階段反法西斯侵略的文化國際性上亦有其適切的支柱性質，這一文化運動是什麼意義呢？曰：「革命的人文主義」（*Revolutional humanism*）。（註十一）

第二節 在落後歐洲與先進的亞洲時期，中國文化

運動一般

中山先生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就是他們（歐洲）的自由，我們的民權主義就是他們的平等，我們的民生主義就是他們的博愛（註十二）。真是「奇蹟」，真是理論的「朋友」，帝國主義危機階段在中國就達到「自由，平等，博愛」先進的運動，一句話，就達到中國的「革命的人文主義。」中國，辛亥革命以袁世凱為中心企圖以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維新妥協。代替着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高漲」，而危害了人文主義的發展，中山先生會把當時迷醉於「立憲」的妥協，認為「不知而行」，提出了「知難行易」的人民主義哲學。五四運動，在啓蒙形勢之下，忠實於自覺手段的人文

主義運動，喚起了全中國的文化覺醒的粗糙觀念，一方面忠實於自覺手段的感性運動，本質上却是自覺手段的不自覺或絕對的布爾喬亞理想，他方面更要求深刻的發展，這一發展一直到大革命前夜才受理想的洗刷，具體地更本質地集中於「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國已經接近於「知而後行」的革命的人文主義。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暴虐與侵略的現階段，中國首先發動了歷史未有的光榮抗戰，一方面「自立更生」，為獨立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執行中國歷史的上向運動底任務，他方面打擊法西斯毀滅人類的資本主義下向衰微底任務，因而中國文化運動，在中國本身發展上與世界資本主義衰亡的矛盾中，更展開了自覺的，批判的，人文主義的文化運動，更深刻的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

「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即（歐洲）統治的資產階級因為害怕正在發展的普羅，所以維持一切落後的正在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正在衰亡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已經衰亡的及正在衰亡的勢力聯絡，以便保持動搖的僱傭奴隸制」。『強大的民主運動在亞洲到處發展着擴大着，日益強固起來，那裏資產階級還與民衆共同反對反動勢力，數萬萬人民正在醒覺起來，求生活，求光明，求自由』。（註十三）

在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中山先生推崇的「革命聖人」有這樣兩句話：「歐洲的共和國統都是資產階級底僕役，代辦，木偶，而這種資產階級又是完全腐化了的，從頭到腳泥身都是沾着污泥與鮮血：那裏的總統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資產階級早已拋棄了一切青春理想，已經完全淫亂了，已經賣身給百萬富翁，資產階級化的封建地主了，然而這裏的亞洲的共和國總統（中山先生）卻是革命的民主派，卻是充滿着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概，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並為將來而拚命奮鬥的

，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其臭爛和妨礙生活的廢物；而不打算爲維持自己的特權來圖謀保持和恢復過去的東西。」所以，中山先生被推崇爲「戰鬥的民主主義者，代表真正的高度的民主主義的高漲。」（註十四）

在目前，帝國主義的復古運動，象徵於「法西斯」的字面上，資本主義的衰亡是和中世紀的農奴再版結合着取得「物極必反」之反人文主義的退化內容（註十五），這一下向運動，在亞洲逢到「中國復興」的上向運動，革命的人文主義的高漲。在這一矛盾的解決方面而言，執行資本主義法西斯的東亞「阿Q」，就和「偉大的，善於解除束縛的中國人民」，逢到一個狹路，而清算歷史上的一筆「混賬」！

第三節 上向運動的中國文化之展開

「中國越落到歐洲日本之後，民主革命就越沒有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妥協維新路綫」。中國祇有革命的人文主義的全面發展，始有新中國的道路。中國的啓蒙路綫，應是採取着法國革命時代上向線的「人類解放」（*Droits de l'homme*）——中山先生所謂政治革命，更應不約束於「人類解放的自由主義與利己主義」。後進的民主革命，歷史上曾有過由上向到下的矛盾，德國革命便是好例。中山先生所謂「徹底的民權革命」，應是吸收了「法國革命的德國哲學」的上向，而不拘束於德國革命的國權主義，假象的立憲代議制之下向，而不拘束於中山先生所謂「僅僅得到代議制度爲已足」，（註十六）在文化上並不拘束於「以自由主義代替民主主義」亦即中山先生所謂「民權是平等，不是自

由所能盡意。」（註十七）

人文主義，從德國一八四八年以後，各國民民主主義的運動變更了本質，陷於自由主義，如一八七八年意大利的國民運動，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的俄國自由主義運動，以及東歐各小國的國民運動。中國，應揚棄了意大利以後的啓蒙運動的妥協的質變，始有人文主義的前途，中國革命太「遲」的程度上變化，達到性質上的變化，不可能在稍遲的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的假象的人文主義路上緊隨着，而是變種地追奔法國式的政治的人文主義與德國的文化的人文主義，所以中國的啓蒙運動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無所取擇於上向與下向的人類解放運動，而是具體的發展的批判的歷史傳統繼承。這是過去新啓蒙運動的文章中所最沒有弄清的概念。（註十八）

爲什麼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徹底的真正的高度的民主主義的高漲呢」？就是說它已追奔到法國革命時代上向綫的人文主義；爲什麼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主義是「民主主義的補充」呢？就是說「我們要不滿於德國一八六六——七〇年由上而下的改革，還要由下而上的運動補充起來」。（註十九）批判地接受啓蒙運動，變種地採取人文主義，便是中國統一戰綫的人文主義，革命的人文主義。

而且，世界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因了新要素的附加，國民的自由主義變爲國權主義，進而國權主義變爲農奴制保有主義（日本便是好例）；到了法西斯階段，野蠻復古，絞殺文明，黑暗專制，已經達到高度，中國的人文主義文化主義文化運動的積極性，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暴敵的侵略戰爭中，更具備了高度的創造精神。

當法西斯否定了數世紀人文主義文化最好傳統精神，而代以中世紀的黑暗專制，向死亡綫飛奔時

，中國却批判地接受了這一文化傳統的核心，復在中國數十年的歷史中經過了實踐的薰陶，把它發展而為新科學運動，新人生觀運動，現實主義運動，大眾化運動，戰鬥的反法西斯暴力的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偉大的統一團結的民主主義運動，保障國際的民主和平運動，批判的啓蒙運動，一句話講，「自由平等博愛」，或「求生活求光明求自由」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或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運動。

第四節 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與中國的文化發展

在全資本主義體系遭遇最深刻危機的基礎上，產生了法西斯的科學與哲學的尖端危機。科學哲學不再是解放人類的工具，而是擁護奴隸制底官學的自由主義的手段（註二十一）。尤其在法西斯成長強化方面，把前世紀德國人文主義的革命之魂削去，把黑格爾哲學的反動的保守的觀念論的神祕的體系，復活起來，弄成法西斯最粗野的，現代神祕的宗教的理論基礎，把黑氏絕對理念的發展，普魯士王國的神聖化，變做第三帝國的教條，更引伸而為「希特拉即上帝」的國家論。這些奴役人類與屠殺人類的「新論理學」，「新哲學」，「新範疇表」，同時亦是現代科學一般危機下之文化悲劇。它的護道者有克羅納，森底拉，以馬爾克，里比爾諸大德意志法西斯代言人，一羣現代僧侶主義者（註二十一），在危機面前，在滅亡線上，爲了幻想的安慰，發明了所謂「不滅的哲學」（PHILOSOPHIA PROEUNIS）。在東方的日本，有擁護「庶政一新」的法西斯「模訃爾」的渲染者，如三木清的「歷史的理性」與菊池寬的「東亞和平」的大亞細亞主義。

在資本主義死亡線上的法西斯種族哲學，把人對人的關係改變爲狼對人的關係，拿毀滅文明，絞

殺哲學，取消民主，破壞和平的野蠻暴力，而宣揚優等種族的文明，而企圖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所以反法西斯運動，除了歷史的特別的反資本主義金融獨裁而外，還有救人類沈沒的人文主義之復興運動。因而革命的人文主義的普遍的號召，形成全世界民主主義陣綫的適切的文化運動。

在資本主義下向發展到死亡線上的運動過程中，中國人民負起革命的人文主義的使命，為保障政治的民主（民族獨立）而鬥爭，為人類歷史的進步與中國歷史的紀錄而創作。中國的批判的人文主義文化的創造，是中國歷史具體任務的上向運動，答覆法西斯世界史的下向死滅冒險。中國和全世界進步勢力共同負着創造歷史的使命。因而這一國際性——民主主義的高漲，在文化上的通約便是革命的人文主義。

世界資本主義的危亡，法西斯對內取消民主自由對外破壞政治民主，把資本主義的最好傳統一齊抹殺，而代以殺人放火的中世紀古版；反之，中國的人文主義由批判的見地看來，却是繼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好傳統。在資本主義的自己否定自己的文明中，而中國執其最好文明而作否定法西斯的武器，因此中國的光明便產生於世界的黑暗中。「中國活的頑石」，由粉碎却變做了團結力，這團結運動正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的核心。

總之，法西斯主義的復古運動，與中國落後的中古殘餘，是一個文明的板本，中國一方面在反侵略的鬥爭中反抗世界資本主義的復古，他方面在進步上向奮鬥中徹底消除中古暗蔭。這個任務的結合，在變種的文化觀點上，便是批判的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註二十二）。

第五節

人文主義的發展與衰落

爲了更對於革命的人文主義深切地了解，我們須說明一下人文主義的歷史。

人文主義，在歷史的上向運動中，一開始是想像的自覺，即將人類由超世界的「天堂」，拉到一個絕對人性類概念的寓言世界，例如亞且士密斯的前行者滿德威爾的「蜜蜂寓言」，這個想像世界門口上掛着一塊招牌：「惡德便是善惡」，據他們的理想，中世紀失掉的「人類」，請在個人自由的彼岸招魂，這時代相當於汎神論時代，或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其次，是自然的自覺，即將人類放到大自然享樂中，由僧侶主義的超世界觀拉到自然主義的現世觀，初期文藝復興的自然主義「新人」運動即其代表者。再其次，是社會意識的自覺，即經濟（英國）政治（法國）哲學（德國）一般布爾喬亞意識手段的自覺，這時的人類的號牌是自由平等，雖然是人類解放一般的理想，本質上却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在爭取解放中，人類大多數羣統一參加歷史的前進變革，最典型的代表作爲法國革命。

（法國 JHUR ANITE 的被採用，不是偶然的）

人文主義，在歷史的下向運動中，首先呈現出歷史前進與古董保留的矛盾，「一方面苦於資本的發展，他方面又苦於資本發展之不足，爲死的所苦，更爲活的所苦」。（資本論第二版序文）「爲死的所苦」是反封建的前進變革，「爲活的所苦」是這一變革附加了新的要素（更進步的普羅）。例如，方法與體系的矛盾之黑格爾思想，正是布爾喬亞革命的全時代之產物，是無力的德國布爾喬亞，一方面苦於新要素，他方面苦於全世界封建反動之產物。所以意識形態的上向，形成了「革命的代數學」，同時人文主義的下向形成了反動的妥協論。所以，人文主義在歷史下向方面最明顯的特徵，是布爾喬亞與封建妥協的自由主義，代替了革命的民主主義。人文主義的這一變質，即把勞動人民一開

始便擴棄於最形式的方面。一八四八年（新鬥爭掩蓋着舊鬥爭的轉期）的英國經濟學者小彌爾便在這樣條件之下，不可能為李加圖「無所顧慮」的科學態度與革命的意識的繼承者，而在「心上的危機」開端了所謂庸俗主義的先河（註二十三）。歷史最下向的發展，人文主義更變做國權主義，越向東跑越變質，經過帝俄而達日本，人文主義更變做半隸農的所謂「維新」：人類解放的內容，採取着啓蒙形態，達成着封建——資本的聯盟，大多數人類被中古的舊腐爛制度所束縛着。

人文主義在歷史的時代發展中（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要求出新的內容，它在歐洲祇有前進人類的人文主義，對立它的是反人文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說教，故意曲解的庸俗主義，例如經濟學上的新古典學派（奧大利學派）哲學上的新黑格爾學派，一直到社會法西斯主義者。

資本主義的死亡線下，法西斯復古運動，「人類」被看做「士兵」，集中營的新奴隸，新十字軍，徭役徵夫，爲了防衛「文明」的新萬里長城，新運河或新金字塔建造的殉工者，爲了資產階級寄生享樂的新阿皇宮建築的罪犯。苦難代替了生活，黑暗代替了光明，枷鎖代替了自由，愚昧代替了科學，而人文，人道，一筆勾銷！然而凡此都被「無」的理論化裝起來，這是法西斯反動的代數學（全能）。

第六節 團結於三民主義文化實踐中

「革命的人文主義」的提出，正當民主主義開始變自由主義的時代，前進方面需要人文主義，後退上又不需要人文主義，抽象意識上要求啓蒙的徹底，現實變革上復要求解放的不徹底。既要「青春

的理想」，既想將來，復畏將來，既想團結勞動人類，又仇視勞動人類。

因此革命的人文主義，「本質上是批判的」，有下面的諸意義：

一、打擊後退的自由主義（我們常見的書上有「對於反動者卑躬屈節的自由主義」，「把戰鬥的民主主義，改變為自由主義」等）對封建要取的「決定的勝利」，把民主主義幹到「徹底」。（如山先生說「妥協是徹底解決的大錯」。）

二、繼承法國革命的徹底性，不以新要素的附加而變質，正因新要素的力量而可能深刻一步。

三、「使法蘭西革命的德意志理論」，取得合理核心。把官僚的集中主義制度，成爲一八七一年的「廉價政府」，「民衆政府」，（這一點，中山先生在革命的初期，就提出，「合衆政府」一個偉大的觀念）。

四、人文主義的法國版，最本質的東西，是前進的人類的大團結，革命的人文主義，到了歷史前進與後退的矛盾中，就批判地要求新歷史的前進人類大團結。反之，前進人類的分裂，就造成自由主義的妥協。（有人把思想解放與自由主義等看，那是錯誤的）復次中國的文化運動，是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依孫文學說講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由上看來，進步的向下妥協便是自由主義，取銷了人文主義的內容，而進步的向上團結，要採取歐洲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粹，即徹底的人文主義文化，此其一；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與農工政策是向上發展而且「信仰將來」的偉大思想，此其二；不爲舊知識所束縛，繼承世界的「好學問，好知識，好方法」創造行易知難哲學，此其三；團結，統一，作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基礎，此其四。中國革命的偉大領導者，充分發揮了革命的人文主義體系。

現階段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全民族的團結統一，不但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的號召，已經具備着基礎。廣大的人民都結合着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在目前統一團結的加強，更是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之全面展開。在政治上克服漢奸落後陰謀而鞏固統一，是批判下向而高揚上向的意義。在文化上肅清最庸俗的應聲思想而堅定「正確的認識」，亦是防止下向而推進上向的意義。所以革命的人文主義，本身就是前進團結的文化。現階段中國的「人類」解放任務主要集中於民族解放。

中國社會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使啓蒙文化大衆文化更爲必要，他方面使世界進步文化中國化亦爲必要。所以，解決中國落後性「爲死所苦復爲活的所苦」之矛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正是繼承德國革命的傳統，而不拘束於德國革命，即以革命的人文主義做批判的文化運動。中國爲法西斯日寇的反動侵略所苦，後爲落後的營環境所苦，解決這一難題，正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的二重精神。

沒有革命的團結，便沒有革命的人文主義。團結的發展在文化意義便是發揚光大三民主義並實踐三民主義，便是團結前進而批判落後之大衆人類「自我」覺醒。在二期抗戰開始，中國批判了妥協自由主義的典型，揚棄了中山先生所謂大錯意識的人物，已經承繼着中山先生中華革命黨的傳統精神，在文化上言，就是革命的人文主義之實際發展。

第七節 「知難行易」的文化傳統繼承

思想，知識，認識的普遍運動，是人文主義的覺醒前題，不但是中國上向進步的文化奮鬥，而且是反日寇法西斯愚昧的文化奮鬥。

爲真理而戰，即應廣泛發動真理的追求，爲自由而戰，即應爲必然的認識而奮鬥，使必然轉化而爲自由，即抗戰必勝的「正確的認識」，轉化而爲驅逐日本出中國之民族自由解放。

第一，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在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把舊世界的舊觀念重新批判，承繼好的思想傳統，而發展新的認識，所謂文藝復興正是以這樣做出發點。最高統帥最近一則曰「以從頭做起的精神貫徹到底」，一則曰「恢復同盟會以前的反抗精神」，實在是文化的基礎領導。

第二，「知難行易」文化理論必須延長。在統一團結的基礎上，追求正確認識的領導，實在是全面戰爭的精神條件。如果我們說，知難行易學說，是克服民元一部分做自由主義後退妥協的理論領導，則人文主義，便是克服抗戰過程中做自由主義後退妥協的理論領導。革命傳統的精神是一貫的。這是加強團結方面必要的文化基礎。

第三，「人類製作自己歷史」的能動要素，必然在未認識以前，人類是物質自然的奴隸，一但把物質自然的必然認識，物質必然便由人類支配，成爲自由，所以說「日本如勝……事物法則皆要推翻」，祇有我們中途而廢放棄現實，才能給與敵人以可乘之機。

第四，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基於廣大人民團結的大衆「新人」覺醒，惟有這樣「新人」的民族生活內容，中國始能在舊世界奴役關係中解放出來。歷史教訓我們，祇有意識的進步，而無前進的人類內容團結，至多產生德國的古版，然而就是這一個版本，在遲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進步路線中，也絕對沒有前途了。（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講的人類生存中心意義，以及爲什麼用「民生」二字，要從人文主義了解，另文詳論）。

第五，民族解放戰爭本身，是改正歷史的一種創作，亦是最高的最純潔的一種藝術，在抗日戰役中有民力團結的新戰鬥藝術，在政治新生中，有民主組織的新作風，在文化領導上同樣地有革命的人文主義覺醒的新意識。如果說民主是團結數目的乘積，那麼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覺醒便是使乘積無窮大地可能以幾何級數繼續不斷擴大起來。這一偉大力量要從日寇以飛機大炮所寫的歷史中，澎漲破舊殼，降生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主要是賴團結——文化意義上的革命的人文主義，既為青春理想而奮鬥，復「信仰將來，並為將來而拚命奮鬥」。抗戰建國途中，沒有妥協，妥協是分裂，不是團結，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的反對物，不是「知難行易」的批判認識。

第六，損毀前進精神，便跪拜於舊世界物質環境條件之下，「戰鬥的民主主義」不然，「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其臭爛和妨礙生活的廢物」，「充滿着高尚精神與英勇氣魄」，這種的文化，才是革命文化。日本軍閥的舊東西，已經使半隸農文化沒落而為十足的中古廢物，侵略愈深入，便益能賞鑑到遺棄落後而團結前進的新中國，愈爬入中國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新花園。

第七，全世界民主陣線的進步人類，正在以團結文化，革命的人文主義，和絞殺人類的法西斯黑暗鬥爭，而中國的這一團結文化的向上運動，就與世界進步文化相為結合，取得了文化國際性。正因為這樣，日寇法西斯與他的友人才設法破壞我國偉大精神，才造謠中傷，挑撥離開中國進步的團結文化，不以侵略化裝為「防共」，便以中國抗戰謂破壞「文明」。

我們不單限於反愚昧，要知識，我們更要在「人類」（人文）前進生活內容上而努力作文化的保障與光大。

所以，由思想解放到整個民族與民衆生活的解放，才是革命的人文主義與革命的民主主義之文化政治的統一意義。

中山先生說：『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這是三民主義文化上中山先生的自己詮解，是再明顯沒有的。在目前，我們最具體的引申便是：前一任務爲反法西斯侵略的文化，後一任務爲革除落後而向上進步的文化。根據中山先生所示，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那麼，這裏所謂「打不平的文化」前者是對外打不平的文化，後者是對內打不平的文化，這一「打不平」的中心統一的意義，即革命的人文主義。

第八節 中山先生文化運動的理想

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是革命的方法論，亦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原理領導。

首先我們知道，「孫文學說」是發表於民國九年，正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捲起的時代，給與封建文化否定認識的時代。當時，科學與德模克拉西的思想解放以及人類解放運動，衝破了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藩籬，民主中國的啓蒙運動，要批判地繼承了辛亥革命之中山先生所謂「無意中得之」，「實在是不知而行」之傳統。

劃時代的文化運動，在意識自覺手段方面就要和民主革命的正確領導統一，換言之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運動和中國民權革命「徹底」性的任務，要在步驟上劃一起來。

然而當五四運動文化領域中「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雜然並發，缺少主導的觀念時，中山先生早已在文化領導方面提出，「知難行易」學說，以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爲核心，即以批判的人類解放的思想爲核心，而與其「駕乎歐美而上」「澈底的民權革命」相爲配合，號召於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這一意義，需要強調地了解，五四文化運動，可以被自由主義所代替，在智識追求方面可以退步到「國故整理」的學究新裝中，在文藝寫作方面可以伸入「藝術之宮」的隱士洋樓中，然而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領導與真正的民權革命「高漲」的領導沒有在中山先生學說中一日分離。

革命的人文主義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唯一出路，因爲中國「落後於歐洲與日本，祇有澈底的民主主義的道路，」沒有德國式的意識進步而政治反動的前途，也沒有十九世紀意大利與東歐各小國以及二十世紀初葉俄國自由主義啓蒙運動的前途。更沒有日本「維新」的文化運動前途。從袁世凱反動起，中國歷史都證明中國沒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封建妥協而取得維新的道路。德國以至日本都有所謂「假象的議會主義」(Scheininstitutionalismus)到了中國據中山先生說「却變成豬仔議員」。

所以，中國文化運動，是批判的承繼法國啓蒙運動與德國啓蒙運動，以及世界最好文化傳統，而與中國民族解放，民權革命相爲配合，中國的人文主義是以新的民主爲內容的，所以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說：

民國建元之物，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也。是豈予之理想太

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理想太低耶？」

這是重要的史實，中山先生要極力實行「地方自治」，以達「徹底的民權革命」而當時不知者卻要步自由主義妥協之路綫，所以歪曲現實的妥協者便把中山先生革命的理論與他們「爬行的經驗主義」對立起來，說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馴至把屈服於反動者命為「革命的實行家」（參看孫文學說中陳英士先生追悔書），而把革命的理論指導認做「理想太高」。所以中山先生會指明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而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家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

中山先生深知道辛亥革命是「無意中得之，不知而行者」，辛亥革命後復不能依據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建國，所以說：實行家「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闢，欲使後知後覺者，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

革命的民主主義在徹底詳闢追求真知的運動方面，不約束於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從文化的意義上講，便是革命的人文主義，中山先生對於「維新」約束的否定，有精到的言論如下：

「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求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求先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得，則行永無期也」。

中國革命不能約束於日本維新的妥協盲從道路，不能模仿日本維新，而是日本維新的一發展（見中山先生對日本記者言論）。所以中國革命必須求革命的正確領導理論與方法，而不是妥協實行家所

能辦到的。所以「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爲模範，雖不能完全做仿其辦法，也應做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註廿四）這一繼承革命傳統的認識的發展學說，實在是革命的人文主義的精髓，他的批判的知識論，散見於民權主義中，在那裏批評了自由主義，批評了歐美民權革命的「太呆」性，批評了德國革命的不徹底性（如稱俾斯麥政策爲民權的第三障礙），高揚着法美民權革命的人類解放價值，更高揚着俄國革命的徹底價值，最本地得出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連帶解決的結論，試問這一批判的認識，不是革命的人文主義麼？

中山先生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臨代大會宣言引此二語，將人羣改爲民意）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幾無不成者也。」把握現實運動，認識發展的實在的可能性，而以革命的實踐，（決志行之）使可能性轉化而爲現實性，這便是不但認識世界，並且變革世界的意義。

因此，中國問題的認識，不但不能被普國式的自由主義所約束，而且復不能被資本主義所拘束，而是根據世界潮流與人羣需要的發展而亦發展。大理想主義便是現實主義，這二者的統一，便是革命的人文主義。

民生主義四五頁以後有一段偉大的言論，正是表示革命的人文主義的特質，且節引於下：

「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祇知道有民族主義……以爲只要推倒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在當時以爲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所以他們對民權主義不明白，對

於民生主義更莫明其妙。……民國成立……大家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對於民權主義有許多都是模稜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毫無心得，……經過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兩個主義都是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權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

「革命的基礎在高深之學問」沒有革命的眞「知」，就沒有革命的篤「行」，所以中山先生提出革命的自覺手段之認識，用通俗的形式把革命的人文主義內容裝進去，那種舊形式便是「知行論」。

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的精神，不是研究室的古典主義，而是集中於以下的一點：中國社會現實地發展，中國革命理論的正確認識也隨之發展。中國革命的領導，一方面要承繼十八世紀以來世界變革的寶貴遺產，他方面復要爲將來世界潮流的變革而奮鬥，批判的承繼過去的人類解放運動，復準備爲將來人類更深刻的解放而努力。簡言之，徹底爲民權主義而奮鬥，復不爲「太呆」的民權制度而約束。所以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新知識新方法追求的文化運動，形成了革命的人文主義之文化領導。

（註一）參考「魯迅訪問記」，登太編，包括當時的論戰文字。

（註二）參看「戰時文化」第一卷，五、六期合刊，申府先生的「啓學運動的過去與現在」一文。

（註三）皆見中山全集三卷。

（註四）民意二字，中山先生原文爲人羣。

（註五）國際文化卷頭語。

(註六) 申府先生上文。

(註七) 參看顧頡剛先生「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見中蘇文化特刊。

(註八) 見廣州出版的民族文化。

(註九) 見再生某期。

(註十) 戰前認識月刊艾思奇先生的論文，即主此旨。

(註十一) 這一術語，在中國首次發現於文壇中，見中蘇文化某期何思敬先生文中。該文論文化運動頗多好的見解，而尙缺乏全面的發揮。再，這一術語的出處，見「德國觀念形態」。

(註十二) 三語首見同盟會宣言，本文所引句見民權主義。

(註十三) 見「落後的歐洲進步的亞洲」一文。

(註十四) 這層要明白平均地權的意義，參看拙作「民生主義研究」一文，時事類編廿八期。

(註十五) 參看「在他人旗下」與「維新的中國」二文。

(註十六) 見民權主義。

(註十七)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反對自由各節，卽長忌把民主主義變爲自由主義。

(註十八) 啓蒙運動在歷史上有變質的過程，那一種啓蒙是中國的路綫呢？應注意研究。

(註十九) 恩格斯語。

(註廿) 參看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

(註廿一)參看米丁等著黑格爾紀念論文。

(註廿二)革命的人文主義的提出，在當時爲反動時代，原文上有高揚上向打擊下向的文化意義，所以說是批判的。在內容上是繼承革命傳統精神而防止後退妥協的自由主義。所以說是革命的。爲什麼有變種的觀點？這是中國革命徹底性的反映。

(註廿三)參看資本論第二版序。

(註廿四)見「對黨員訓話」。

中山先生論蘇聯

中山先生在十四、五年前關於蘇聯的認識之言論，散見於三民主義及講演電文遺囑中不下數十條，在以當時的文化水準以及蘇聯建國材料而言，還沒有分析研究的可能，所以中山先生一再說「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但是不論就先生的「推斷」，或就總括地原則上估價看來，現在都是十分正確的偉大見解。當時西歐第二國際正在拿「農民暴亂」曲解蘇聯革命，或以列甯所訂新經濟政策爲資本主義的復活，進而斷言革命之路不通；全世界資本主義代言人又羣起拿叛亂，窮困，過激，侮蔑蘇聯，而先生則獨具慧眼，大膽爲理性認識之最高評判，這實在是我們現在應當學習的精神。本文且不採取綜合的研究，祇先把先生所論分條列舉於前，試作按語，姑爲將來系統研究的準備而已。

(一) 關於蘇聯革命的意義者；

「像俄國的人民，可以說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甚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全集第三卷，三七一頁)

「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利害，因為那種和平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世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民族主義，七一頁)

「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素歷，都是由於革命

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民權主義，五一及五二頁）

『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在其他地方中山先生稱爲工人獨裁的政治，或勞農政府）。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民權主義，八七頁）

謹按：在上面所舉示的幾段文章裏，雖然有的地方所用的語彙和後十五年的現在有些不同，而在要點上確已把蘇聯革命的精神道破，這一認識的價值，在十五年前的世界輿論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常爲一般人所忽視，在十五年來蘇聯建國的發展過程中，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現，却又爲一般人所忘記，未能探求這認識的寶貴指示。

第一：不但解釋而且變革世界的意義——中山先生把握着歷史發展很緊，在民權主義中批評歐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幾乎佔居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認爲這樣的民權革命是「不徹底」（二九頁）的革命，民權問題尙未解決，而民權風潮則與時俱進，故「還要再起革命」，認爲這樣的民權制度是低度的東西，「所得到的祇是代議政體」的最形式的民主，所謂有「流弊」的民主，認爲「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爲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認爲「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然而歐美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祇有「俄國革命是澈底的革命。」

列甯也說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幹到澈底時，便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所以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指示了德國革命的兩個可能的前途：一個是革命僅僅到資產階級的階段就算告終，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更高度民主的轉變。列甯在一九〇五年對於俄國革命的命運也同樣地說：「只有兩條路，（一）完成「革命對沙皇政治取得決定的勝利」的工作，或是（二）沒有充分的力量得到決定的勝利，讓沙皇和極「不澈底的」最「利己」的資產階級要素成立妥協」又說：「他（考茨基）用這些引證來證明關於俄國是落後的，而從這種意見上得出的結論却是舊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下，不應比資產階級跑得更遠。這完全違反馬克斯與恩格斯在比較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所說的話」。

中山先生一再說俄國革命給與世界上「一個很大的變動」，一個「改變世界潮流的變動」，一個「造成新世界」的世界變化，他又說這是「用革命的方法造成的」，所謂半亞細亞的，所謂落後的俄國，爲什麼就「駕乎歐美而上」，不以「歐美民權爲止境」，「社會主義與民權主義相連帶」同時解決呢（皆見民權主義文句）？這是不是一種「跳過歷史的行程」之命令解決呢？不是的，據中山先生說，這一方面是賴於主義的貫徹，氣魄的堅決與方法的良好，認識的正確，他方面是賴於革命聖人領袖的指導，並非超歷史的，而是正確地執行歷史任務的。他說：「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俄國人因爲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所以革命……成功。……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知識，有了智識便有方法，有了方法來革命，就馬到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沒有好學問好方法……實在是不知而行」。全

集第三卷（四七頁）又說：「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同上，三三四頁）又說：「俄國革命……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於其首領列甯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爲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之最好的模範」。（同上二五八頁）

「民主不是不可逾越的限界」，蘇聯革命沒有跳過歷史，然而却在逾越過資產階級民主的限界，即中山先生所謂「駕乎歐美而上」的民主制，他的民主，確如中山先生所說，比資產階級民主「改良得多」，由中山先生所謂「政權由資本家從中把持」，而達到工農民主專政（中山先生稱爲人民獨裁），這兩種民主開程度上的區別據列甯說，相差有一百萬倍。

沒有以「歐美民權爲止境」的蘇聯革命，有沒有「社會主義與民權主義連帶」解決的可能性，不是考次基的「經濟分析」所能抹殺，而是有主觀與客觀的條件的，試看列甯的話：

「不錯，在我們同全體農民一起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十分明白地認識了，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說了何止千百遍，我們從沒有企圖跳過歷史行過底這個必要的階段，也從來沒有企圖用命令來取消牠。……」

「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我們公開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不能停止在這個階段上了，因爲我們國家已經前進了，資本主義已經向前發展了，破壞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了，這破壞要求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所以想把工人的萬里長城，置於這兩種革命之間，或以其他的方法來隔絕這兩種革命，……簡直是以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斯主義。」

其次我們也要重視主觀的力量，即中山先生所謂「氣魄，奮鬥，組織」的力量。革命當時的主觀力量，已經有歷史的許多證明無待說明，即到了新經濟政策時代，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還要賴奮鬥。列甯「誰勝誰」？說「或是無產階級領導着農民獲得勝利，或是小資產階級的要求走向了資產階級。」所以，祇有領導的正確，蘇聯農業發達才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不但在新經濟政策時代，即在五年計劃亦有不同可能性的前途，仍要奮鬥的條件，如斯達林說：「我們因為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已經趕上而且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然而要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還需要技術的經濟的各方面趕上而且超過那些國家。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不然就要失敗。」

第二、高度民主制度的認識——中山先生把蘇聯革命認做成功最大的革命，說這種「改良得多」之民主制度，就是他所要造成的新世界。當然的，這就合於他所謂「民權新力量與政府新機器」的意思。然這却也不是「純粹的民主」僅是高度的民主，「被壓迫者民衆的組織，這組織取消了剝削者的選舉權，就是說不是代議的空談底機關，而且同剝削者鬥爭的機關。」（列甯話）「指示出：甚至落後國家中，甚至最少經驗，最少教育，與最少組織習慣的工農，在同剝削者鬥爭中，也能夠保持其政權，同時造成比世界上所有一切民主更高更廣的民主，開始實際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全上）

例如考次基，會把這種「成功最大，改良得多」之民主，誣蔑為「專橫」，攻擊其為反民主的制度。實在到現在還有人這樣的解釋蘇聯。中山先生在十五年前就把這種誤解實行清算了。他批評歐美

民主僅得到代議制度的形式民主，亦批評德國革命後「阻礙民權最大手段」或「民權第三障礙」的俾士麥主義，叫做「專橫」，（參看民權主義），然而對於蘇聯民主制度，雖以當時材料不夠未能判斷究竟爲遺憾，而却堅決承認「人人分取紅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爲「改良得多」之民主制度，即高度民主制度——「一個新世界」，「偉大的歷史變更」。這和列甯的言論不期相合：

「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民主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應用程度。誰要認爲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由少數剝削者轉到多數被剝削者的政權過渡……不經過激烈的轉變，不要造成新的民主形式，不造成那種含有應用民主的新條件的新機關等等，誰就是最荒謬不過的了！」

中山先生所謂的這種新世界，亦「就是說，爲着大多數人民而實現這樣一種利用民主權利和自由之實在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就在最完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也從來沒有，甚至與牠相近也沒有見過。」（列甯）

中山先生強調地說：「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這一指示，又和以下的話不期相合：

「資產階級的民主隨時隨地都答應：一切公民一律平等，但無論何地都沒有實現過，而無產階級專政都把這個平等即刻充分實現起來。」（列甯）「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法律上給與平等權利，而事實上又排擠出去，可是現在蘇聯這些羣衆都經常左右一切地參加民主式的國家管理。」（全上）

在十五年前，即蘇聯革命後六年，在一般人死咬定蘇聯退步的時候，中山先生已經說蘇聯建國，「進步的神速」，在兩個五年計劃後，斯達林新憲法成功的現在，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進步更可以

想見了。

試問「打破資本家把持」的民主制度，是更高民主式的呢？還是所謂「專橫」呢？專政是不成問題的，「專橫」則是少數欺壓多數，試問中山先生所謂「人民獨裁」，這「人民」是少數麼？中山先生生批評俾士麥政策時，用過「專橫」，用得再不能得當了。因為德國革命採取了與封建勢力妥協的路綫，在無產階級力量成熟的時候，「專橫」，是合呼資產階級要求的。

第三：蘇聯革命及社會主義之實現問題——關於蘇聯革命社會主義的實現，中山先生從方法學問的養成，組織的完善，領袖的指導，主義之貫徹各方面，皆有肯定的論著，原文見前，無待再引，此外又有「決心」的主觀要素，拿現在的話講，便是「爲了什麼而堅決奮鬥」的意思，即「人類自己製造歷史」（馬克斯語）之積極活動的意思，例如他說：「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所以「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俟諸空談也。」（全集第三卷，三三四頁）

我們知道，蘇聯革命後，就有很多人拿馬克斯所謂物質條件之矛盾，而攻擊俄國經濟落後之盾，意謂如物質條件具備學說是正確的社會革命應發生於英美，而蘇聯革命未必合於馬氏主義，如蘇聯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則馬氏主義非確實。二者必居其一。這是一種社會自己生成論，未能了解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化。

要知道，歐戰時的世界「一般的危機」便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皆有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而可能性

所以轉化而爲現實性，主要在於真確地把握現實而決心變改現實。例如德國革命的失敗，便有錯誤領導者曲解現實並放棄現實之意義。俄國革命正是在物質條件具備的時候，根據於經驗與方法起而無所「顧忌」地執行偉大歷史的人類使命，亦即中山先生和某俄國人在英國圖書館所討論的那一篇大道理（見全集第三卷，一四五——一七四頁）。中山先生由此，得出革命「百年大計」的經驗、方法、知識，學問以及氣魄之教訓結論，譽爲「榜樣」。

復次，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克服內外困難（中山先生謂之阻力）的認識，且引兩段蘇聯學者的話於下，以證「決心」之重要性。

「對於布爾喬亞諸關係的復古，具有完全防止的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之終局勝利，只有在國際的規模上，才是可能的」。但是不論在一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困難，或這個國內資本主義之復古——由於外國干涉——的危險，並不成爲否定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之論據。這些困難與危險，不過是條件。這種可能性是被根據的運動，被國內勞動階級能否克服其內部矛盾所解決的。」

「社會主義，並不能依據自己生長而從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只有通過鬥爭，革命的活動，才能如此。……列甯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的勝利，他祇說：「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政治上對於我們保證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工事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並不是實現性。爲要使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首先應當放棄自成論，對於都市與農村之資本主義的要素加以決定的攻擊。」這便是人類在物質積極性活動的意義中，變改現實的意義，「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論諸空有」者，就是這個道理。

(二)關於俄國性的三民主義者；

「俄國人民這種幸福，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

「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如果三民主義能够真正實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全集第三卷，三四九頁）

「英國美國……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國好得多，但是他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他們革命是用什麼主義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義。……除英美革命現在醞釀還沒有爆發以外，現在已經爆發的俄國革命，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什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想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俄國內發生革命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同盟國，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對於貧富的關係，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故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當時革命軍竭其全力奮鬥，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蘇維埃共和國。……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以下是一大段將來幸福的敘述，最後他說：）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全集第三卷，三六八——三七一

俄國革命時……之爲十八面受敵，各國均派兵到俄國，其國內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國援助，故俄國六年前之奮鬥，均爲民族主義的奮鬥。當時我們尙不知爲民族主義奮鬥，今回顧起來的確如此。故現在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皆引爲同調，常對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諸國，勸其不可放棄民族主義。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可見俄國之革命，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全集第三卷，一五五頁)

謹按：中山先生提到三民主義實行於俄國的言論甚多，尙不僅上面所引用者，在民生主義裏關於新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的類似性亦有婉轉的說明。在民權主義裏關於俄國高度民主駕平資產階級民主而上的贊揚，亦有所謂「新世界」的相類說明，在民族主義裏則顯明地講述了二段俄國「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的道理（見民族主義六〇——六一頁）與「俄國公理撲滅強權。以及與被壓迫國家聯合」的道理（同上二二——一四頁）。這裏有一個問題，俄國是三民主義的國家麼？不是的。那麼三民主義實行於俄國的話又是什麼意義呢？我們需要馬上了解：

(1) 中山先生的三打不平主義，如果從廣義上而言，十五年前的蘇聯，尤其到了現階段的蘇聯，一、執行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內的民族的民主聯合，外的民族的獨立自主之任務，二、執行了駕乎歐美資產階級民主而上的高度民主制度之任務，三、執行了消滅階級對立的社會主義任務，完成三打不平的新世界。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蘇聯實行了三民主義的精髓。

(2) 蘇聯所持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祇要所含真理與現實相合一，真理便漸漸接近起來，因為真理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私有的，是全世界所共同覆載着的。真的二個主義的信仰者應該都是真理的執行者，所以中山先生曾對日本記者說：「中國革命的目的與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最卓絕的精語是中山先生自動給日本記者說明革命發展的大道理：「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可惜日本人維新後反忘卻了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國國民同俄國國民，因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這種爲了真理更深刻奮鬥的發展之聯結性與世界性，對於日本記者可惜是對牛彈琴！然而中山先生革命的「氣魄」，却可以衝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偵探！由這一點講來，如果俄國革命成功是俄國性的三民主義實現，則中國革命成功，將也可以說是中國性的蘇聯主義實現。

(3) 前世紀馬克斯論德國意識革命，是德國革命的法國版，這裏也可以說法國革命的意識發展實現於德國。再如由列甫論巴黎公社與蘇聯革命的聯結而言，也可以說俄國革命是法國巴黎公社版，因此，「俄國革命遲中國革命六年發生，而早已成功」(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話)，中國辛亥革命確給與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最大影響，那麼一九一七年革命也可以說是俄國的中國版。世界革命歷史的傳統，越到深刻的階段，越能吸收革命的最好教訓與經驗，倒不管革命性質的異同，革命的傳統是繼而開來。所以，三民主義實行俄國的話，實在有意義的，但我們却也

不能說這個革命是那個革命的機械的再版。就以中山先生所盛贊的革命聖人列甯而論，也不是他所盛贊的社會主義的聖人馬克斯的機械承繼者，而是發展了的馬克斯主義者。

(4) 中山先生雖然說俄國實行了三民主義，可是每提到這種意義時，總在蘇聯革命精神方面給與適當的評價，並把蘇聯革命成功的最大效果以及達到目的之努力，推崇到最高尚的境地，因此，中山先生的俄國性的三民主義實現言論，不但沒有混淆了俄國革命的意義，不但沒有絲毫曲解了革命的價值，反而在其直率的敘述中，發揮了俄國革命的精神。甚至中山先生還拿中國王道的實現，崇贊蘇聯，這也並不是曲解歷史，而是推崇俄國繼承了數千年歷史最好的傳統，亦猶之乎「聖人」一概念，在中國自有解釋，而中山先生兩次用「聖人」贊佩列甯時，首先說「由革命的觀察點看起來，」亦是對於人格高尚最高標誌的評語。

(5) 中山先生所謂「宏大圓滿」「成功最大」的蘇聯革命成功，(列甯說是最深刻的革命)與三民主義連結而言，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即中山先生要證明其主義是成爲歷史最好傳統的主義，在中國沒有成功無由證明，在俄國却達到其革命精義所示的目的，所以一再舉示，爲同志輩堅決奉行者勉勵，其亦善誘教訓之革命聖人！中山先生在這一點，很正確地說這是「暗合」，不但沒有自己抬高自己，說蘇聯革命師其方法與精神，反而在十三年時代幾乎每次講演告誡同志，要師法蘇聯。下面便是證明。

(二) 關於蘇聯革命的經驗與教訓者

「他們所以能够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列甯，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就是我們的好模範。」（全集第三卷，五〇七——五〇八頁）

「此時轉向於你們（蘇聯），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甯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全集第四卷，七二頁）

「俄國革命，真是徹底的革命，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俄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厲害，且百倍過之，特俄國革命黨之聰明厲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全集第三卷，一五一頁）

「列甯今已逝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及何種教訓？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有組織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革命黨一樣。……列甯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精神存在。此即為我們最大之教訓。」

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做效其辦法，也應做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興廢，如列甯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全上，一五八——一六〇頁）

謹按：中山先生曾把俄國所成就的功績，敘述到結論，說「這個新世界就是我要造成的世界」

，他把俄國革命實在按照一個樣本看待。列甯也曾說過，蘇聯革命的成功，使落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獨立的奮鬥，提供出可能實現的模範來。蘇聯革命的教訓，把落後的革命運動的困難克服，提示了最好的材料。

這便是「不朽的遺教給與被壓迫民衆的世界之真遺產。」這一點，列甯的遺教，詳載於其論民族革命諸問題中，我們應當精讀的。

中山先生，對於蘇聯革命的教訓，在方法上，經驗上，知識學問上，奮鬥決心上，組織力量上，以及其整個革命的規模樣本上，編成革命軍隊上（見第三卷四八三——四八四頁），都推崇做中國革命的模範，冀倣效其精神。這一點，不但是革命領袖之虛懷若谷，而且是承繼世界革命傳統的偉大精神。

因此，中山先生便從實踐中與蘇聯接觸，不但僅空虛地模仿而已，他說：「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在現在看來這是多麼精確的教訓。中山先生這種意思恐不爲人所了解，他又降低論旨說：「俄國進步之神速，……使英美日三國會均欲提攜承認新俄羅斯，……故就利害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

現在蘇聯更不是十五年前的蘇聯，其教訓與經驗更加豐富，其進步之神速更爲列國所承認，我們應該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如何地接受這寶貴的精神遺產呢！

（本文發表於蘇文化特刊廿七年）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477B

289

400493